

联合国 大会



Distr.
GENERAL

A/43/368
19 May 198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四十三届会议

临时议程 * 项目 67 (a)

审查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
通过的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军备竞赛和军事支出的经济
和社会后果研究

秘书长的报告

1. 大会通过第 40/150 和第 41/86I 号决议，要求秘书长在他任命的一个合格顾问、专家组协助下，将题为《军备竞赛和军事支出的经济和社会后果》的报告予以更新；同时照顾到该报告编成后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此后，大会要求秘书长将研究报告提交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

2. 秘书长根据上述决议的要求，谨向大会转交关于军备竞赛和军事支出经济和社会后果的研究报告。

* A/43/50

† A/37/386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83IX. 2)。

附件

军备竞赛和军事支出的经济
和社会后果研究

目录

	<u>段 次</u>	<u>页 次</u>
秘书长的前言.....	-	4
送文函.....	-	6
导言.....	1 - 8	10
<u>章 次</u>		
一、军备竞赛的变迁.....	9 - 59	16
A. 军备竞赛的性质.....	9 - 13	16
B. 军事开支.....	14 - 21	17
C. 核武器.....	22 - 27	22
D. 外层空间的军事使用.....	28 - 30	25
E. 化学武器和细菌(生物)武器.....	31 - 32	26
F. 常规武器.....	33 - 36	27
G. 军事研究与发展.....	37 - 42	28
H. 军火工业及生产.....	43 - 50	31
I. 军备转让.....	51 - 59	34
二、资源和军备竞赛.....	60 - 83	39
A. 自然资源.....	61 - 68	39
B. 人力资源.....	69 - 74	43
C. 技术.....	75 - 83	46

目录(续)

<u>章 次</u>	<u>段 次</u>	<u>页 次</u>
三、军事开支和社会经济发展	84 - 146	51
A. 一般考虑	84 - 89	51
B.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90 - 95	54
C. 对人力资源的影响	96 - 100	56
D. 对技术的影响	101 - 105	58
E. 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106 - 109	60
F. 金融流动和债务的影响	110 - 119	62
G. 对社会文化情况的影响	120 - 129	65
H. 改变用途方面的影响	130 - 146	69
四、军备竞赛的国际后果	147 - 170	75
五、结论和建议	171 - 188	83

秘书长的前言

本报告是联合国根据大会委托对军备竞赛的经济和社会后果进行一系列研究的第四份报告。报告由秘书长为此任命的顾问专家组根据1985年12月16日第40/150号和1986年12月4日第41/86I号决议的要求进行编制。他们根据要求将1982年完成的题为《军备竞赛和军事支出的经济和社会后果》的上次报告予以重写更新。

核战争威胁可能导致整个文明的毁灭，因此联合国久已视之为世界面临的最大危险。而且，特别是近年来，由于常规武器日益蔓延和先进，以常规武器进行的更加剧烈的武装冲突不断造成悲剧和苦难，令人极度不安。1982年以来，联合国记录了在武装冲突中使用化学武器——1948年确定为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情形。这些变化是多方面活跃和竞争性军备竞赛造成或加重的明显、直接后果。

该小组的报告表明，即使在没有冲突的情况下，军备竞赛也导致许多经济和社会现象，包括无力维持的军事支出、与民用生产相比军工生产过多、军火生产扩大到更多的国家、大量技术资源分拨到军事研究和发展方面、盟国之间以及向非生产国转移武器，总之，过分军事化。虽然由于国际债务增加，这些现象略受遏制，但仍然存在。

该小组指出，近年来出现了若干因素，可以缓和这个悲观的前景。这些因素包括专业深入分析，从而导致了关于扭转军事集结趋势方式和方法的新的富有现象力的理论和思想。偏重民用生产的工业转换问题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领域之一。在一个比较安全、和平和公正的世界里，可以进行相当大规模的裁军，而这样一个世界总是很难实现，世界舆论对此日益表示关注，并对提出实现这一目标的着眼于行动的提案日益关心。最鼓舞人心的是，1980年代中期以来，两个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明显改善，两国间军备限制和其它领域的谈判达到了新的水平。最后应指出，人们更加认清世界的相互依存和环境的脆弱，因此，区域和普遍关怀问题的

资料和讨论更加公开。

秘书长对顾问专家组成员专心致志的工作精神和顺利就涉及问题取得一致意见的努力表示赞赏。应该指出，由于所审查的问题错综复杂，本报告的意见和结论是顾问专家组成员的意见和结论，秘书长不可能就其工作的所有方面发表评论。

送文函

1988年4月22日

联合国秘书长

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阁下

秘书长先生，

谨送上阁下根据大会1985年12月16日第40/150号和1986年12月4日第41/86 I号决议要求任命的军备竞赛和军事支出的经济和社会后果问题顾问专家组的报告。

根据大会上述决议任命的顾问专家如下：

Lazhar BOU OUNI先生

法律和政治大学

教授

突尼斯，突尼斯市

Jan CHANDOGA先生（第三次会议）

联邦外交部

裁军司司长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布拉格

Hendrik DE HAAN先生

格罗宁根大学

教授

荷兰，格罗宁根

Dragomir DJOKIC先生

南斯拉夫常驻联合国副代表
纽约

Constantin ENNE 先生

外交部

对外经济关系、条约和国际组织司司长

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

Juan E. FISCHER 先生

乌拉圭代理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纽约

Ladislav MATEJKA 先生（第一和第二次会议）

捷克斯洛伐克常驻国际组织代表团

公使衔参赞

维也纳

Adrianus MOOY 先生（第一次会议）

国家开发计划署

财政和货币司代表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Semen N. NADEL 先生

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

处长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莫斯科

Waliur RAHMAN 先生

孟加拉国驻意大利大使兼孟加拉国常驻联合国罗马各机构代表

Christian SCHMIDT 先生

巴黎大学

教授

法国

Amada SEQARRA 女士

瓜亚基尔外交和国际关系学院客座教授、裁军研究咨询委员会成员

厄瓜多尔

Darold W. SILKWOOD 先生

军备控制和裁军署

核武器和控制局

防务方案分析处

处长

美利坚合众国，华盛顿特区

Margaret VOGT 夫人（第一次会议）

指挥和参谋学院

研究主任

尼日利亚、雅吉——卡杜纳

该报告编于1987年3月至1988年4月，在这期间，该小组举行了三次会议，第一次于1987年3月16日至20日举行，第二次于1987年11月30日至1987年12月11日举行，第三次于1988年4月11日至26日举行。第一次和第三次会议在纽约举行，第二次会议在日内瓦举行。

顾问专家组各成员感谢联合国秘书处、联合国裁军研究所和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和其它组织以及各研究所和大学人员提供的协助。他们特别感谢主管裁军事务的副秘书长明石康先生、担任小组秘书的威廉·劳勒先生和担任秘书处顾问的赫尔辛基大学莱莫·瓦里恩博士。

顾问专家组要求我以小组主席身份代表小组向阁下提交其一致核准的报告。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军备竞赛和军事支出经济和社会
后果问题顾问专家组主席
康斯坦丁·埃恩(签名)

导 言

1. 关于军备竞赛和军事开支的经济和社会后果的这份报告是秘书长自1971年¹以来在他任命的专家的协助下进行的第四次研究。第二和第三次研究报告分别于1977年²和1982年³提交大会。简略回顾上述报告所揭露的军备竞赛的特性和影响可以作为本分析的背景，同时有助于显示过去十年来军备竞赛现象的连续性和变化。

2. 1977年报告首先重申公认的意见，即核武器所造成的自我毁灭的威胁是世界所面临的最大的危险。其主要的研究结果之一是军备竞赛日益成为世界性的现象，虽然其强度在不同区域之间有显著的差异，很少国家以及没有一个主要区域能够不卷入军备竞赛。其他明确的结论如下（只能简略叙述）：

(a) 主要军事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到目前为止是世界性军备竞赛最主要、危险和耗费资源的方面，也是其主要的推动力。军备上的一切重要新发展均由此而推展到世界其他部分，这种竞赛主要是质量上的竞争，因此军火的数量显示不出其激烈性；

(b) 军事竞赛在质量方面的进展导致了不安全局势并对裁军的可能性产生不利的影 响，因为决定性的因素是设法击败最先进的武器和对这些武器采取相应的防御性手段，因而军事技术很快就过时。因此，裁军进展的适当标准必须包括限制质量军备竞赛的措施；

(c) 人口爆炸、粮食危机、毁灭性的自然灾害和战争使消除贫穷、改善人类福利和促成工业化和增长等问题更加严重，在世界许多地方到了危急的地步；这些领域的需求同军事需求相竞争。军事开支方面即使略有裁减并将由此节省的某些资金重新分配明显地可以得到莫大好处；

(d) 军备竞赛对政治、经济和社会有深远的直接影响。某些情况下，外来势

力的压力或干涉对政策选择施加了许多限制，这种限制可能同国民的愿望抵触。另一些情况下，武装部队成为对国内政治以及民间活动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这时，军备竞赛就对民主程序构成威胁；

(e) 军备竞赛的最重要特色是，危害国际安全，导致大国介入战争(包括核战争)的危险不断存在，以及一系列无终止的小型战争，不利于建立一种有助于在国际中减少武力的作用的气氛。

3. 1977年报告的许多研究结果在1982年报告所讨论的期间仍然是正确的，不过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战略方面有了显著的改变。因此最近的报告再次确认，核自我毁灭仍然是人类面临的最大的危险，加强军备无法达成有效的安全。报告也确认以下发展：

(a) 世界军事支出数字显示1978至1981年的增长速度高于1977年报告之前的相应年间的增长率；

(b) 国际政治气氛极端沉重，1970年代发展出来的缓和进程在1980年代初遭到严重挫折；

(c) 军备竞赛的主要参与者之间的紧张和对抗局势加深使在世界各地的危机温床变本加厉，划定、攫取和控制势力范围的冲突继续不断；

(d) 1980年代初所继承的是裁军谈判陷入僵局的一种局面；

(e) 1980年代的全球经济前景仍然与裁军方面的进展有密切关系；

(f) 前沿军事技术的创新进一步模糊了军事大国的战略和战术武器以及常规和核武器之间的界限；

(g) 好的方面的主要一点是人民大众日益认识到战争的危险，尤其是核战争的危险，以及科学和技术日益用于军事部门引起了群众的反应。由于群众得不到资料，这方面的影响，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群众无法了解的，也无法加以左右的。

4. 本研究揭示军备竞赛类似的不利影响继续存在，但比早先两份报告所审查

期间发生了更多变化。 报告中表示，1980年代中期军事大国的军备竞赛，特别是核领域的军备竞赛随着武器和武器库的现代化而持续不断，尽管过去三年来，这些大国之间进行的对话和国际气氛有所改善。 军事技术进步仍然超过裁军谈判的进程，政治战略考虑继续阻碍全球经济局势的改善。军事对人力和物力的要求仍然影响着社会经济进展。 同时，目前有了日益细致地了解和平、安全和裁军的必要条件的更多要素，也出现了某些向前看的态度，有可能逐步改变国家和人民传统的行为模式的感觉，以及关于实现社会进展、改善人类福利和在较低军备水平上作出更合理的安全安排的论调。这种新的态度反映于最近的许多研究、大会决议和其他提案，其中鼓励或试图精确地分析核与传统军备生产和获得军事技术和武装冲突的短期和长期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及其他影响。

5. 本报告大量引用了上述发展的有关分析和经验证据：

- (a) 虽然世界军事开支继续增长，增长的规律改变了，主要由于经济情况恶化而造成债务日重，必然产生了许多限制，特别影响到最为脆弱的发展中国家。 目前军事开支的增长因此几乎完全出自工业世界或者局势紧张或实际武装冲突的具体地区；
- (b) 世界各地目前发生的冲突，不论有没有外来的参与，已更形紧张和悲惨，寻求解决的不不断努力均未能生效。 在更具毁灭性的武器的助长下，这些冲突变得愈加剧烈，使在物资和人力方面所付出代价更大。 在某些地区，仍然存在着冲突范围加大的严重危机。 首次，联合国证实和记载在这些冲突中使用化学武器。 恐怖主义的使用也增加了；
- (c) 军事上最重要的国家已经进行或者计划进行进一步的技术革新和（或）现代化，某些新的进展，就军事效能而言，可能进一步使常规与核武器系统之间的界线分不清了。 军用的研究和发展与军事技术的急剧变化步伐正被更加广泛地认定为不仅对战略和战术有显著的影响，同时特别是在长期

上对经济实力和社会进展——从而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也对国际安全——有不利的影响；

- (d) 国际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表现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关系，自1984年后期至1985年初期以来关系改善了，在1985年11月苏美两国日内瓦首脑会议之后，尤其大为改善；两国领导人在该次会议通过的联合公报上同意核战争没有胜利的一方而绝不能进行此种战争；⁴
- (e) 裁军领域内，所有各级均出现日益建设性的论坛和更加积极的谈判。苏联和美国成功地缔结了关于中程和中短程核弹谈判，一旦条约得到批准，则将彻底销毁这类核导弹。关于裁减战略攻击性武器、关于空间军备和关于核爆炸试验也不断地进行实质性的双边谈判。在多边一级，在这段期间，裁军谈判继续进行，差距日益缩小了，缓慢地迈向协议，特别是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协议；
- (f) 关于军备竞赛的技术和经济层面的资料有所进展，使得大众能够更多地审查军事开支和技术进展的广泛影响。这对工业国家进一步加重了压力，要求政府对复杂、昂贵的技术和项目说明其净安全效益和与社会经济的关系。这种压力的基础是群众继续认识到，技术事故可能发生，核武器仍然是人类前途的一种威胁；

1990年代的全球经济和社会展望仍然与人们所看到的国际安全局势的改善分不开，国际安全局势的改善又可能使裁军领域有更大的进展。这将需要政府决策者更妥善考虑到世界人力、自然和物资资源，从而引导人类的活动。1987年8月21日至9月11日举行的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国际会议与会者在《最后文件》中协商一致地重申，决心将裁军所腾出的一部分资源拨充社会经济发展用途，以期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但是会议的参加者也强调非军

事方面对安全的威胁，承认“人们日益认识到，过分军备和发展不足都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人权大规模地遭受侵害和贫穷、文盲和贫困妨碍了真正的经济社会发展，也造成了紧张局势和冲突。’

*

*

*

6. 自1978年大会未经表决通过至今仍然有效的第十届特别会议，即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最后文件⁶以来，秘书长就军备竞赛和裁军的若干具体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涉及的问题为核武器、裁减军事预算、裁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建立信心的措施、国际安全与裁军、常规武器、安全的概念、以及核威慑。⁷ 这些研究应视为在裁军和有关问题上提供更多资料的诚意努力。

7. 专题研究可以审查军备竞赛及其影响的若干方面，只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本
报告及其以前的报告综合性地调查军备竞赛和军事开支各种不断变化的后果，
这些研究的目的是揭露其最近的影响。在根据大会1985年12月16日A/
40/150号和1986年12月4日A/41/86I号决议修订1982年报告时，
协助秘书长的专家小组希望，他们的研究结果将有助于突出军备竞赛对世界和平与
安全、对各国经济和社会福利的有害影响。

8. 本报告第一章说明军备竞赛的动力。主要着重的是军备竞赛中各种类别
的军备和武力对经济和技术的影响，其主要动机和机制，它们所涉及的各种费用和
商业。第二章评价在有限资源的世界用于军备竞赛的自然、经济和人力资源，
目的在审查在不同的情况、经济和社会中政策决定的影响。第三章分析军事开支
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其中包括其对经济增长、人力资源、技术、通货膨
胀、资金流动和债务以及社会文化情况的影响；也考虑朝向民间活动的工业转换的
影响。第四章分析军备竞赛的国际后果，考虑其在国际、区域和国家各级对社会

的全面影响，其中包括非军事方面的影响，并分析政府决策者可作的选择和优先事项。第五章总结专家小组的研究结果，并提出旨在减少和扭转军备竞赛的不利后果同时避免造成反作用的某些建议。

第一章

军备竞赛的变迁

A·军备竞赛的性质

9·国际军备竞赛是一个复杂的多方面现象，无法诉诸简单地解释；它的主要特点是相互竞争角逐的国家之间对等行动的起落沉浮和各自为加强军事力量所采取的单方面行动。不过，如早先的《军备竞赛和军事开支的经济和社会后果》的研究报告中所指出的，其最重要的特点是“它破坏国家、区域和国际安全”。⁹军备竞赛是一个相互影响的世界性现象，军事大国和它们之中的各种行动和反应起中心的作用；它也表现出区域和地方色彩。早先的报告确认军备竞赛的程度“在各地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所有主要的地区都介入这场竞赛，只有少数国家没有参加”。¹⁰军备竞赛也有其多面性，它具有政治、经济、技术和，最重要的，安全因素。安全因素的因果关系反应在军备竞赛与国家间角逐的关系上。这意味着，国际紧张局势、争端和冲突提供了获取新的和更多的武器的理由，而获得武器又使困难的关系和冲突更加恶化。甚至更重要的是，军备竞赛又造成军事大国交战，包括进行核战争的危险。

10·不过，军备竞赛主要也是国家为追求安全和（或）权力而有意采取的政治决定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从国内的角度看来，全球或区域冲突和国际紧张局势导致有理由必须采取这些决定。另一方面，如上文已经指出，大国的国家军备方案相互影响，导致争相获得军备的决定和升级的过程，在捍卫本国国家相对安全的努力上，往往所根据的境地是依照最坏的情况设想。同样地，在区域范围内，一个国家作出这种决定的原因是自身感到军事干预的威胁，或者自身感到外国干预内政的威胁。

11·军备竞赛的变迁绝不是新的现象；它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整个期间一直在进行着。1980年代，核战争的威胁——由于意外、估计错误或者甚至

是一项精打细算的战略行为而引起的核战争的威胁一直都持续着。1982年报告也认识到人类所面临的这种危险，而今日这种危险仍然存在。

12. 在1980年代中，直到接近其中期以前，国际环境一直日益恶化。苏联和美国的的关系，以及它们的许多盟友之间的关系，受各种紧张局势的影响。这一部份是由于发展和部署新的核武器和常规武器造成的，这些武器被敌对双方看成是可以用来发动、持续或加剧战争造成威胁的工具。技术发展使政治问题和估计动机更加困难，因为在核查和军事效能方面更加难以划分常规武器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而尤其是核武器之间的区别。但是从其破坏力及其使用对社会环境造成的长期危害的巨大差别看来，这两种武器的差别似乎应该是很明显的。

13. 不过，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政治环境有了改善。美国和苏联成功地谈判了题为“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销毁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的销毁两类核武器的双边条约。¹⁰ 它是关于射程在1,000至5,500公里和500至1,000公里之间的导弹。1987年12月10日在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之间的首脑会议结束时发布的联合声明中，两国领导人强调该条约的目的是彻底销毁美苏两国一整类核武器，加上其核查条款的创新和广泛程度，使该条约具有历史意义。另外目前还在就削减战略核武器和外层空间军备这个问题进行谈判，同时已经开始就核试验的进一步限制进行双边谈判。多边限制军备会谈，特别是关于化学武器的谈判，已进一步加紧进行。这种新的国际合作精神会进一步加强全球和区域的信心，这会在大幅限制军备方面取得具体进展，从而减少战争的危险，增强国际安全。

B · 军事开支

14. 军事开支是一个国家用多少资源保护国家安全的一种粗略衡量方法。世界军事开支的升级可以从简单的事实看出，1982年的报告提到1981年全球军事开支为5,500—6,000亿美元，1985年的数字，以当前价格计算则为8,500—8,700亿美元。

15. 由于一些理由，这些有关军事开支的数字距准确的程度极远。有些国家不提供其全部军事开支的数字。此外，在比较各国军事数据方面也有一些客观上的困难，其主要困难是不同的经济体制所造成的价格系统上的差异和以国家货币计算的军事开支数据转换成一种共同货币：美元。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和平研究所）年鉴《世界军备和裁军》¹¹中未提供1986年的世界军费总额，因为目前有关苏联和中国军事开支的资料并不充分亦不可靠，不足以对世界军事开支总额作出精确的估计，并且其他国家的预算也未显示所有军事开支。因此，不可能对世界军费总额提出一个确切的数字。以下三个附表所列的数字只表示军事开支的演化；从和平研究所的早期数据，粗略地描绘出用于军事部门总资源的情况。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全球军事开支一直持续增加（详情见下文表1）。事实上，1980年至1985年世界国内总产值年增长率为2.4%，军事开支的相应增长率则为每年3.2%。¹²这表示1980年代在世界有限资源中用于军备竞赛的相对比例比以前高。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世界军事开支以实值计算已增加了四倍到五倍，大约消耗了世界总产值的6%。¹³如果上述的趋势得以持续，则在没有大幅军备限制的情况下，本世纪结束以前以时价计算的全球军费有可能达到10,000亿美元。这意味着1982年的报告所作的类似估计并不过份。¹⁴

16. 该报告详细记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军事开支如何增长，以及它们在个别区域和个别国家之间的分配是如何高度不平均。这反映当今世界体制中经济和军事上的不对称情况。为了保证各项数字可以比较，本报告中选用数字的准则与历次报告使用的准则相同。以1980年价格和汇率计算的这些最近数字如下。

表 1。1976—1985 年一些国家集团的军事开支
 (以 1980 年价格和汇率计算的世界军事
 开支总额和占该总额的百分比)

	1976	1979	1982	1985
六个主要军事支出国 a	71.2	70.8	68.4	70.4
其他工业国家	14.6	14.3	14.1	13.9
发展中国家	14.2	14.9	17.5	15.7
世界总额 (百分比)	100.0	100.0	100.0	100.0
世界总额 (10 亿美元)	511.5	561.9	615.1	663.1

a 六个主要军事支出国，按英文字母次序排列，分别为中国、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17. 六个主要军事支出国以外的其他工业化国家在过去 10 年的份额非常稳定。主要军事支出国的相对位置逐渐下降，直到 1980 年代初由于国际形势紧张和实行备战计划，因此又开始上升。除此以外，主要军事支出国的支出型态与从前的趋势没有很大的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则为例外，它把军事上的一部分人力和财政支出重新分配，以支持经济现代化计划。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支出自 1960 年代以来以绝对值计算和相对值计算都一直增加，但是自 1980 年代初起已经下降了。表 2 的数字显示不同类别的相对份额在 1985 年又回复到 1979 年的情况。要进一步了解这种情况，必须对支出数据进行分析。

表2. 军事支出增长率, 1976-1985年
 (实现支出平均年增长率)

	1976-1979	1979-1982	1982-1985
六个主要军事支出国	2.3	1.9	3.7
其他工业化国家	2.9	2.8	2.3
发展中国家	3.0	9.1	-0.9
世界	3.3	3.2	2.6

工业国家的军事支出一直增长。不过在主要支出国中, 1979-1982年的增长率较低。这一集团国家的军事开支在1982年以后又恢复上升, 一直持续到审查期间结束时止。1982年至1985年间发展中国家的军事开支也发生重大变化。其军事开支的负增长率首先反映出出口价格的下降和全球债务危机的加深。这已减少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加强军力而特别是进口武器的能力。出口收益的减少和外汇储备和武器进口的相应下降已经是这些国家军事开支降低的一项主要因素。

18. 如果探讨石油出口国军事开支的增长型态就能明白世界经济发展状况和发展中国家的军事开支之间的紧密关系。从1976年到1979年, 这些国家的军事支出每年只增加2.6%, 但是在1979-1982年所谓第二次石油危机的那几年, 却每年高涨到10.6%。从1982年到1985年, 这种情况正巧相反: 石油出口国的军事开支每年下降-1.8%。事实上, 这种下降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大很多, 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支出如表1所示在百分率上下降, 但是如表2所示从1982年到1985年实质上仍然差不多保持不变。油价和出口收益的减少因此成为石油出口国的军事经费减少和军备进口下降的主要因素。

19. 但是经济拮据只是影响将国内资源用于军事开支和军备进口的决定的因素之一。政治抱负、大国的影响、当前的国际紧张和冲突、对外来威胁的看法、国

内的不安定、以及自然现象也继续影响关于支出的决定。 为了更详细地了解那些似乎影响军事开支的决定的因素，按区域的细分即分别计算每个主要区域的增长率，可能有些价值（见表3）。

表3. 按区域开列的军事开支增长率，

1976-1985

(实际开支的平均年增长率)

	1976-1979	1979-1982	1982-1985
北美	1.8	6.9	7.3
欧洲	2.0	1.8	2.2
中东	0.3	10.9	-1.7
远东 ^a	8.7	8.2	4.2
南美	2.7	19.6	-7.3
非洲	4.4	1.7	-2.9
南亚	3.2	8.1	5.5
中美	12.9	8.3	4.3

a. 不包括中国和日本。

在两个主要联盟互相对峙的欧洲和北美，军事开支继续增长，迄今为止它们是这些区域中最高的。 此外，在审查的这十年期间，它们的增长率加速了。 其余的区域分类证实有各种程序管制军事开支的增长和下降，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与以前的支出数额相比，财政资源耗竭差不多立即影响全体公共支出，但是也影响军事开支。 例如，南美的外债显然是这种下降的主要原因。 在南美，大多数国家广泛恢复宪政形式的政府也造成有利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优先次序的重新安排，从而促成逐渐减少军事负担。 在非洲，大部分由于广泛的自然和社会危机造成资源稀少，而实际停止和扭转任何增加军事支出的趋势。 在一些非洲国家，外债增加也促成抑制军事开支的增长。 在中美洲，广泛的并涉及外国介入的区域冲突，导致

军事开支即使在经济危机下仍然有所增加。在南亚持续不断的紧张和冲突与遍及各处的不稳定——这部分受到外来干涉的影响——使减少军事负担变成不可能。在远东，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特别是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等次区域的紧张或冲突继续存在，助长了主要敌对国家继续在武库中累积武器。

20. 政治和军事上的紧张不一定是军事预算消长的最重要因素。中东是经济拮据造成军事开支减少——尽管该地区国家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持续对抗——的一个实例。然而解决军事冲突和政治上的不稳定仍然是大量减少涉及冲突各国军事负担的可靠和持久安排所不可缺少的条件。

21. 以用于军事开支的国产总值的百分比表示的相对军事负担的详细审查，显示个别国家间有巨大的差异¹⁵。虽然情况并非都是如此，但平均而言，军事大国的军事负担相对地高于其他工业化国家。例如，两个大国不算，军事联盟的一个普通成员将国产总值的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四用于军事目的，而普通中立国只用百分之二。在发展中国家间，相对的军事负担可能从零到特殊情况下的百分之二十五。在最穷的国家，军事负担常接近零，因为它们根本负担不起军事积累；在半工业国军事负担较大，因为可能已开始发展本国的军事工业；在作战中的国家，军事负担最大。使相对军事负担上升的因素除了外来影响和涉及外来冲突，还有国内的动乱。国内不稳定导致高军事负担这一点由实际调查得到了证明，即紧邻地理区的军事对抗和国内种族分裂的程度是说明一个国家用于军事开支的国产总值的比例的两个最有力的因素。¹⁶

C. 核武器

22. 核革命使军用武器的破坏力增加到新的级别；当前贮藏的核武器的爆炸力是落在广岛的炸弹的一百万倍以上。在数量上，相信世界上一共至少有 50,000 个各种类型的核爆炸弹头。核革命也创造了技术时代的各种新的军事制品，包括战略潜艇、轰炸机和携带核弹头的导弹。除非核武器遭到销毁，这些武器将继续成为人类文明的威胁。

23. 核军事竞赛有量和质量两方面。量的军备竞赛可以用若干指标衡量，诸如运载工具和弹头的数目，质的军备竞赛则表现在武器技术现代化上。核武器极度集中在两个主要军事国家的武库中，它们的相互竞争助长了战略军备竞赛。换言之，核武器的纵向扩散和尖端化的程度超出横向扩散到更多国家的程度。在量方面，衡量苏联和美国的战略力量，则发射装置和弹头的数目是最适当的衡量方法。1986年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重轰炸机及弹头的分布情况如表4所示。

表4. 1986年苏联和美国的战略核武器

	发射装置		弹头	
	苏联	美国	苏联	美国
洲际弹道导弹	1 398	1 017	..	2 117
潜射弹道导弹	922	648	..	5 760
轰炸机	160	324	..	3 343
共计	2 480	1 989	10 000	11 220

资料来源：苏联数据是根据1987年1月23日《真理报》的数字；美国数字来自《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年鉴，1986年》第72—73页。

表4所提供的战略情况自1970年代末以来一直比较稳定，只有战略弹头的数字增加，战略弹头直到写本报告时一直不断地增加。自1980年代初以来，最重要的发展是大国的武库中添了许多携带核弹头的战略巡航导弹。至1986年秋，美国有120架B-52轰炸机，装有空中发射的战略巡航导弹，一共可载2,400个弹头。“苏联在同一时间一共有53架重轰炸机携带战略核巡航导弹。”就总的数量来说，苏联和美国之间有效地维持大约的战略平衡。除了战略武器外，

两个主要军事大国的武库中也有许多其他类型的核武器，从中程武器，到战术核武器，到战场核炮弹。

24. 另外三个核武器国——中国、法国和联合王国——也都继续扩充核武库，并使其现代化，它们也包括各种类型的武器。 据称中国大约拥有20枚洲际弹道导弹和26枚潜射弹道导弹，每枚导弹都配有一颗弹头。 约有100架轰炸机具有明显的战略能力。 法国至少有80枚潜射弹道导弹，共携带160颗弹头。 联合王国有64枚潜射弹道导弹，每枚导弹均装有二颗弹头，使战略弹头的总数到达128颗。 这三个核武器国家都积极计划在未来10至15年间进一步发展其核力量。” 中国继续发展其核武器能力，包括潜射弹道导弹，并且似乎也开始发展多弹头分导返航运载工具。 法国目前有一支六艘战略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组成的舰队，它已开始装配多弹头M-4式导弹。 联合王国为布置在四艘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的北极星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装置Chevaline返航系统而使其现代化。 这些措施总的结果和今后的发展指出这三个次要核武器国所控制的核弹头在尖端化和数目上增加了很多。

25. 核武器的持续增长，不论是纵向扩散或横向扩散，都令所有国家感到关切。 要停止或扭转这种增长的趋势得依靠各国忠实执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的所有规定和其他国际条约的有关规定。 在这些规定中，除了有义务尽其全力交换技术以满足无核武器国家的发展需要。 以便取得核技术用于和平用途外，还包括采取进一步核裁军措施。 专家小组注意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结国第三次审查会议吁请所有国家使这项条约在各国普遍适用。

26. 核武器的现代化建立在技术革新上，技术革新需要试验核爆炸装置及其运载工具。 核武器试验据说对于维持和证实现有弹头的可靠性也是需要的。 随着时间的迁移，核爆炸试验的数目略有增加：1971—1975年期间估计进行了190次试验，1976—1980年期间进行了225次试验，1981—1985年

又稍微增加，估计有240次。²⁰按照苏联本国的官方资料，苏联在1981—1985年进行了76次核试验。²¹在同一期间，和平研究所估计美国进行了83次试验，中国3次，法国38次，联合王国6次。²²苏联倡议，而且坚持从1985年8月直到1987年1月单方面暂时停止一切核爆炸试验。美国没有参加，继续进行试验，特别是作为其战略现代化方案的一部分。其他核武器国家也没有参加。

27. 全面禁试谈判，实际地说，从1981年到1986年，在双边和多边上都是处于冬眠状态，尽管这个问题每年都出现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议程上。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的压力在各种国际论坛上增加了，特别是若干无核武器国采取了具体的倡议，敦促核国家致力于全面禁试，尤其是提议提供它们领土上装置的测震设备，以核查这种协定。在1986年中开始的若干回合的试探性讨论之后，在1987年秋季，苏联和美国同意开始就分阶段禁试的问题进行谈判，首先加强核查它们之间先前的两项双边条约，即称为临界禁试条约（1974）以及和平核爆炸条约（1976），目的是作为第一步，使这些条约能够得到批准。这两国然后希望设段进一步限制试验，同时减少战略武器，从而达成彻底停止核试验的最终目标，作为有效的裁军进程的一部分。²³ 实际谈判于1987年11月9日在日内瓦开始。

D. 外层空间的军事使用

28. 除了民事用途之外，长期以来由于军事目的而利用外层空间环境的有两个主要方面，即用于核查协定和其他侦察包括搜寻情报的卫星和用于通讯和其他相同作用的卫星。因此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问题取决于将武器引入这一环境的可能性。各种国际协定，特别是《1967年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的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外层空间条约）和《1979年关于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天体协定）已禁止将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

武器引入外层空间，与此有关的还有其他一些文书，包括《1972年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双边条约》（反弹道导弹条约）。

29. 但是随着空间技术的发展，到八十年代初已出现将各类高爆和反卫星武器引向外层空间的可能性，这一切促使联合国各个方面采取措施阻止这一发展，其中包括苏联提出的关于禁止在外层空间部署任何种类武器的条约草案。²⁸ 总的来说西方的态度更加具体，主要集中于反卫星武器系统。从1982年起，裁军谈判会议的议程上列有一个题为“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项目。尽管在此问题上继续存在不同的观点和态度，大会在八十年代一般来说还是能够把有关这一问题的各种不同的提议草案合理地组织成单个决议，并得到绝大多数会员国的通过。

30. 一旦防止外空军事化的努力失败，任何使外层空间进一步军事化所可能产生的经济和社会后果都将集中表现在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的巨大花费及其对全球安全可能产生破坏稳定和消极的影响。目前对问题的争论，涉及到许多技术、法律和程序方面的考虑，其中包括空间武器与正在进行的有关战略防御系统（尤其是美国战略防御计划）的研究之间的关系。

E. 化学武器和细菌（生物）武器

31. 化学武器和细菌（生物）武器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这类武器对生物具有特殊的致命效果，因此1948年这类武器与核武器一起被列为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自前一次报告提出以后，《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在1986年召开的关于该《公约》执行情况第二次审查会议上，重申了在1972年达成的该《公约》的持续重要性。然而自《公约》产生后，事实上有关这一领域的所有裁军努力都一直是在寻求产生一个禁止化学武器方面的相应国际文书。这些努力在最近几年得到了动力，其部分原因是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这类相对容易生产的武器已扩散到更多的国家，另部分原因是联合国文件清楚表明，这类武器实际上已在当前的武装冲突中使用。²⁹

32. 自1982年以来，苏联在裁军谈判会议上提出了一个今后文书的基本要素，1984年美国也提出了一项条约草案，在此之后，有关这一问题的多边谈判明显得到加强，自1985年后期苏美两国领导人举行首脑会议后，多边谈判又增加了相互补充的双边内容。到1987年底，裁军谈判会议的具体工作已取得了显著进展。总之据了解，按照新文书，将销毁一切化学战剂（从而防止转向其他用途）；所有化学武器都应公布，一旦公约生效便开始核查；还将对关闭和取消生产设备进行核查。尚未解决的问题包括：秘密生产的可能性；提出疑问后的现场视察；储备规模、组成和销毁次序；国际执行机构；工业管制安排；技术和经济援助。总之，在持续的多边谈判进程中出现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和良好意愿，这使协定的产生似乎成为可能，正在进行的双边接触将进一步促进这一前景。但是在目前，在武装冲突中进一步使用这类武器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F. 常规武器

33. 世界军费主要用在常规部队上。主要原因还不是因为非核武器国家的军费开支大，而是因为甚至是核武器国家，其常规部队就占有所有军费的80%左右。这就是说，对军备竞赛所产生的社会和经济后果及其大部分社会影响的具体分析必须依据常规武器和常规军队来进行。以下事实突出了这一要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所有战争超过150次，都以常规部队进行，根据各方估计，这些战争已造成2,000多万人伤亡，多数在发展中国家。²⁶当前正主要用常规武器进行着一场从伤亡人数来说是本世界第四大的毁灭性战争。

34. 尽管常规武器与核武器截然不同，但它们在很多方面是相互有关的。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和国防政策受到拥有核武器国家的全球战略的影响。在这些国家都卷入的情况下，就要在核武器因素的背景下来看待它们的常规部队和战略。特别是在欧洲，由于引进核力量，因此需要作出准备，加快动员，这有可能使军事危机升级。因此，应继续注意降低欧洲爆发战争和创造更稳定的安全环境的途径。

35. 如上所述，在军事效率上常规武器方面的技术发展十分迅速。特别是已产生一大批制导武器，这类武器可以惊人的准确性击中各种目标，同时又可最大程度地减少不必要的间接损害和过多地消耗爆炸力。另一方面，所涉及的各种技术和由此而产生的武器系统十分复杂、昂贵，在训练和维修上要求也很高。因此，这些先进发展对发展中国家或某些低级别的冲突并不一律适用。总之，凡是使用这些武器的战争，不论是进攻性战争还是防御性战争，都未能避免意外情况的发生，而只会使常规武器冲突的暴力升级和加快全面的毁灭程度。然而如下所述，在军事上研究和发展更加先进的武器的工作仍在继续进行。

36. 很显然，要有效减轻由军事开支所产生的经济负担，就需要限制常规部队，包括质量上的限制。一个努力使各国以可核查和相互接受的方式减裁常规部队的区域方法往往被认为是适当的。减裁可涉及军事材料、部署、人员和开支。²⁷在欧洲方面，已为谈判削减军事联盟之间的军队以及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作出多项努力，以便加强稳定和提高限制常规、化学以及核武器的先决条件。在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方面，1975年的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欧安会）《最后文件》和1986年9月在斯德哥尔摩一致同意的欧洲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及裁军第一阶段会议最后文件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1986年以后，显而易见的是，两个主要军事联盟有必要就限制各自的常规部队取得更加具体的结果，和继关于中欧互相裁减军队和军备以及有关措施的维也纳谈判之后建立一个更广泛的论坛，双方正在建立一个能够满足这一公认需要的新的论坛。

G. 军事研究与发展

37. 武器系统的技术日益尖端化极大地影响了当前军备竞赛的势头、方向和费用。武器已变得更加准确、用途更广、效力更大。从军事标准来看，这一发展使武器更加好用，但是也更易于出现技术上的不足，甚至发生故障。武器系统的多种用途还使人们在危机中对这些武器公开宣称的用途之后的真正用途产生政治疑

虑。 不论在核领域还是常规领域，技术进步是军备竞赛的中心。 技术发明，不论是民用的还是军用的，都是私营和公共大研究机构或工业的产物，它们为了在竞争的世界中生存就得富有成效。 工业体系中对发明的需求是方兴未艾的质方面的军备竞赛的先决条件； 然而技术动力尽管十分重要，可光靠这一项还不足以成为持续军备竞赛的先决条件。 还需要有蓄意的政治决定。

38. 1980年全球用于军事研究与发展的支出以现值美元计算达350多亿美元，大约占同时期研究与发展总支出的四分之一。²⁸ 1980年至1984年军事研究与发展的实际支出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一般的军事支出。²⁹ 全球研究与发展支出，特别是用于军事目的的研究与发展支出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领域，由于没有可比较的定义、估计方法不全面又涉及到秘密性，因此很难达成一个普遍同意的数字。 但是据认为，1985年的全球军事研究与发展支出，以现值美元计算，已增加到800亿美元左右，³⁰ 大约比1980年实际增长了80%。

39. 与任何其他军事资源相比，世界军事研究与发展更集中在一小群国家，表现了一个高技术高度集中的模式。 据估计，六个军事研究与发展的主要花费国至少占世界军事研究与发展支出的十分之九。³¹ 在各国的国家研究与发展系统中，军事部分的相对影响程度差别很大，即使在这六个国家中也是这样。 国家军事研究与发展组织与其余的国家研究系统的关系如何也因国而异。³² 在广泛从事技术革命的国家里，军事研究与发展与技术革命的关系很密切。 与一般制造业活动和通常的活动相比，它对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依赖程度要大得多。 三个研究最深入的部门——即导弹和航天器、电子工业和飞机——都包含着重要的军事成份。 在其他研究密集的部门，军事因素则不太显著，但是它在军用器材和零件、专业和科学仪器以及发动机和汽轮机方面也发挥了某些作用。³³ 军事研究和发展与全面技术发展之间有着不可分隔的关系。

40. 军事研究与发展在很多方面塑造了军备竞赛的态势和社会状况。 它对财政

和人力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当前主要大国的军事设施所依赖的不是单一的武器，而是由电子通讯和控制关节组成的各种复杂的系统，或“武器家族”。这一技术发展不仅改变了军事设施，而且还要求有更全面和自立的机构安排。向前推进一步，这甚至会减少人类的控制，因为有些战场上的决定可由高速电子计算机迅速作出。这可能会增加由于意外或误算而爆发战争的危险。

41. 美国称为战略防御计划的探索性研究方案是一个能够说明这种高级军事研究与发展活动方面新趋势的一个例子。该计划是一重大项目，它动员了美国一大批科学界人士从事其各个次级方案的研究工作。虽然战略防御计划是一个复杂的技术方案，它也有政治层面。现在的争论点是，“从方案的规模和持续时间来看，已产生了反对方案变化的巨大的即得利益。”³⁴ 对任何从事军事研究与发展国家来说，较为复杂的主要武器系统在官僚和技术势头的推动下，一般较易于在国内产生即得利益，从而很难再取消这些系统，即使有此愿望，也很难办到。一旦这些项目已根深蒂固，会有一些合理论点要求取消这些项目，这些论点可包括认识到经济上的需要是否实际可行，是否会对安全或稳定产生不良影响，或提出另外一些可满足原来军事要求的更好的系统，但是所有这些都受到原方案支持者的反驳。

42. 研究与发展支出一般来说在新武器系统的总支出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这些支出不是靠所生产的武器数量来决定的，而是靠支撑研究与发展工作的技术概念和机构安排来决定的。这种状况有两种结果：单位成本提高，结果一样数目的钱生产出来的武器数量比原来少。研究与发展费用是造成军事部门费用上升的中心因素，这不仅因为发展费用高，而且还因为与民用部门相比，军用部门的淘汰率更高。因此要降低单位成本及其对价格的影响，军备生产国已在积极促进武器出口，以此作为加强生产运转的一种手段。目前的军备生产形式需要向外出口，但是国内政治因素和国外正在减弱的需求限制了这一出口。尽管后一原因主要是由接受国的经济因素造成的，但是其政治考虑的演变也产生了限制性影响。这反映出七十年代末期至八十年代初期所产生的变化。

四. 军火工业及生产

43. 国际军火工业是集中的并且有一种由低到高的组织。一小群国家控制着大部分军火生产，通常来说，技术上越尖端的武器系统，生产的国家就越少。由低至高的状况既存在于发达国家和某些发展中国家，也存在于整个全球制度中。主要的军火生产国存在在两个军事联盟中，它们的军火生产不仅为满足国家需要，而且也为满足它们的盟国和其他客户的需要。一般来说，一个能够提供充分市场的巨大的军事体系的存在，加上有足够的国民收入和众多的人口来支持必要的基础设施，是一个国家长远地生产主要武器系统以及取得生产的所需数量和尖端程度的必要条件。”除了这些因素以外，人们还应看到充分的高度技术发展的需要。人们还看到外汇是军火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³⁶最初需要外汇进口军火，一旦国内开始生产，就得进口外国部件和材料来支助生产。

44. 由低而高的状况与军火生产国际化是相互关联的。通常来说，工业化的市场经济国家都发展了本国的军火工业，当然，对小国来说在规模和自主上都受到限制。军火和军事技术的出口往往规模很大，在国内生产上占很大的比重。特别是在西欧，已产生了一个合作生产协议的跨国网络，以便集中资源和更合理地使用这些资源。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也从事大规模的武器生产，不过跨国合作和武器系统出口的规模则较有限。发展中国家的军火生产集中在相对来说少数——尽管数字不断增加——几个国家里。除了也许生产轻型武器和军火外，多数国家都依靠进口。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军火生产国为了支持工业基础设施费用、加强生产运转和降低单位成本，也成了军火出口国。在使军火工业国际化的进程中，几乎毫无例外只包括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少数主要出口国。

45. 在国内生产军火的决定作出以后，到具有当地生产能力还需要有几个阶段。进口的军火在国内进行维修、用国内设备开始生产许可制造的军火、进口部件在当地组装、用大部分的进口投入在国内生产部件，最后，这些投入、原料和中间产品大多由国内生产。这些阶段通常都得到各种分包和合作生产安排的补充，这

些安排可能是称之为“抵消”的补偿商业协定的一部分。³⁷ 这一进程是不对称的，因为它从只有几个大公司控制的工业化国家的军事工业开始，然后渗透到决定从事国内生产的正在工业化的国家的早期军火工业。这些国家间接地接受依靠主要工业国技术投入的新形式。国内生产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依靠进口原材料和间接投入，但是仍被新生产国看成是一种保障，使它们不用惧怕对其国家安全形成潜在威胁的武器禁运。

46. 军事工业在很大程度上已在几个方面达到了标准民用工业，但是它仍然是工业生产系统中一个半自主的分系统。³⁸ 在市场经济国家，这一分系统与公共部门的关系比与它无关的工业的关系更加密切，因为军事部门在事实上是其产品的唯一买主。这一特殊关系有助于将军事机构、立法人员和军火商的利益结合起来。这一利益上的结合和军事工业的特殊性质使竞争欠完善，有关效率和效益的一般标准并不总是能适用于军火生产。市场经济国家最近已作出努力，要在主要武器系统的主要承包商之间加强竞争。³⁹ 政府仍将保护军火商不受外国兼并，但是为了加强效率和降低宏观经济军火生产成本，政府一般都促进它们相互间的更大竞争。

47. 对有关的每个国家来说，不论是市场经济国家还是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其现有的军事工业都是防御基础的一个中心部分。在这一基础上动员的程度如何，应由两个可能矛盾的要求来确定：感到的军事威胁有多么严重和国民经济是否有能力承受加快军事生产的费用。无论感到的威胁如何，经济和资源因素总是对加强军火生产形成一种制约。但是，这种制约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下有不同的表现。在市场经济国家，它主要受财政政策的调整；在中央计划经济国家，是由国家作为关键计划机构负责分配资源给在民用和军用部门而进行调整的。特别是在计划经济国家，军事工业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国家在分配原料、技术知识和技术人力方面发挥着中心作用。⁴⁰ 军火生产和军事技术在所有工业大国中，不论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

经济国家都具有一定的经济意义。这就是为什么说如在分析宏观经济情况和工业发展时不考虑军事工业的影响，这样的分析说的好是有缺陷的，说的不好是引入歧途的。

48. 不论是过去和现在，绝大部分的军火生产都出自工业化国家。由于缺少适当的全球数据汇编，且又存在给军火下确切定义的问题，从而使对其估价的工作产生严重困难，但是可以说，以时值美元计算，1986年全球军火生产价值约有2,000亿美元。过去十五年里，国际军火生产结构的变化之一就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一些活跃的军火生产国。据估计，在1970年本地军火生产的总价值按1975年的不变价值计算共达6,800万美元，而1984年的总价值为63,500万美元之一这两个数字从全球的总况来看确实都是小数，但已看出有很大的增长。⁴¹ 同样，1970年发展中国家通过许可证生产的武器价值按1975年不变价值估计为27,400万美元，1984年则是114,700万美元。在上述阶段，有关发展中国家的军火生产增长速度并不平均，但在整个七十年代增长迅速，到八十年代则实际上是停滞不前。此外，七十年代这些国家本地军火生产的增长速度总的来说超过了通过许可证生产的增长速度。⁴²

49. 任何一个国家跨入军事工业的代价都是昂贵的。要从事军火生产，该国就得拥有相当强的制造部门。传统上，一直将国内军火生产作为替代进口以及促进经济和工业发展的一项战略。⁴³ 最近，新的正在工业化的国家依靠出口导向的工业增长，有目的地开始发展军工生产，将其作为制造部门的一部分。一项研究按照有关国家从八十年代初起军火生产的全面记录情况，将其分成四类。第一类是武器生产品种多、数量大的大国或相对先进的国家。第二组是生产大多数，但不是全部种类武器系统的同类少数国家。第三组国家也生产几种类型的武器系统，但是没有足够能力在本国发展。最后属于第四组的是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它们有一些个别项目，但是没有综合性军火工业。⁴⁴ 根据这一分析，欧洲和北美以外的29个国家被认为至少可从事某些国内军火生产。因此，大约有100个不具备

值得一提的国内军火生产能力的发展中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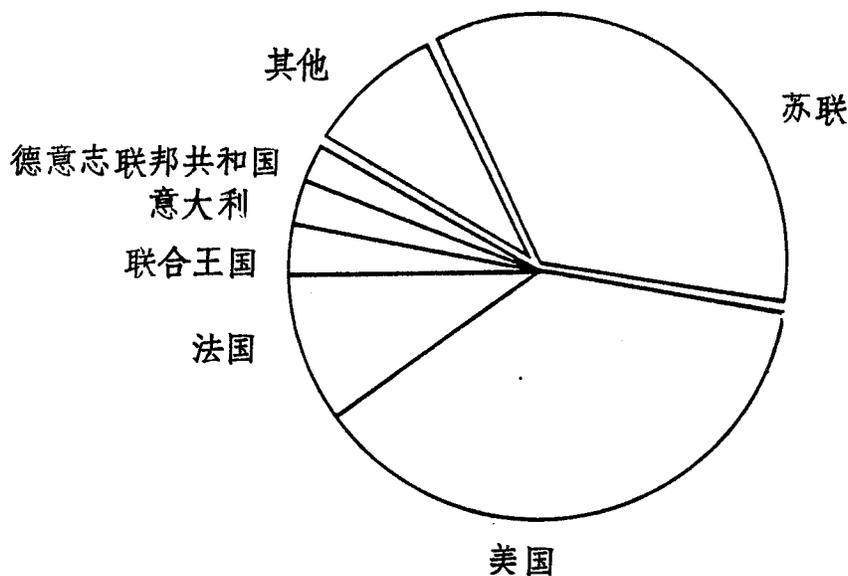
50. 发展和采购军火的两个基本战略是：自力更生和国际合作。自力更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在国家的支持下建立国内生产设备和在当地利用国外军事技术和硬件。计划经济和进口补贴国家尤其米用此一战略，尽管费用上涨和技术的迅速发展破坏了这一战略。国内军火市场大到足以支撑自力更生的军事工业，这样的国家既使有也为数极少，因此已越来越有必要在进口与出口方面与国际市场结合起来。由一些大国政府和跨国公司推动的全球技术发展突飞猛进，因此任何纯由本国发展和生产武器系统的努力都会在日益进步的军事研究与发展面前变为落伍。正是基于这一原因，以自力更生和国内生产为基础的军火生产战略在八十年代失去了吸引力，而那些依靠国际合作生产军火的战略则受到欢迎。⁴⁵另一方面，在主要武器系统方面，日益统一的国际市场在很大程度上迫使国内执行者继续使研究、发展和采购各方面国际化，因为这些执行者必须赶上进行中的现代化过程。

I. 军备转让

51. 国际武器转让包括各式各样的交易，其中涉及到政府和非政府人员。由于资料缺乏，编纂这些资料的标准和方法不一，因此武器转让的整个交易情况基本上是不可能确定的。此外，确定转让的武器的价格十分困难，因为武器贸易经常经由政治安排而不是按市场的竞争进行的。确定某一年份武器转让的价值也要视其估计数是根据签订的合同还是根据实际交货而定。不过，对国际武器转让的年度总值还是作了种种估计。例如，1986年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武器转让合同的总值按现价计算估计达292亿美元，比起1980—1982年最高交易量则少得多，当时每年的合同总额大约为580亿美元（按1986年的价格调整）。⁴⁶1981至1985年期间，国际间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武器转让到发展中国家去，占供应国各自的总交货量的44%至96%不等。⁴⁷不过，主要的武器供应国还向其盟国提

供了大量的武器和军事技术，其中有几宗是向中立国家提供的。这些武器的交付往往反映出盟国内部设法将武器系统标准化，也可能与它们合作进行的跨国项目有关，这些项目的目的是合作研制和采购武器系统供共同使用和出口。近几年来，私人军火商以及各种各样的中间人所起的作用有所增加。他们加入买卖，希望向卷入战争的国家提供武器而从中图利。随着这一趋势，各种私下的军火买卖日益增加。这两种情形使国际武器转让的性质和方法变得更加复杂，而参与交易的各方责任问题更难确定。下图说明了主要武器供应国在国际间的主要武器转让中所占的大约份额。

图一. 世界主要武器的出口份额，1978 - 1982年



资料来源：《国际和平研究所1983年年鉴》，表二. 1.，第269页。

资料来源：“常规裁军研究”（A/39/348），第70段。

52. 为了能够有更生动的了解，我们必须观察国际武器转让的实值的起落形态。在1970年代中期和末期，特别是1979至1980年期间，武器转让迅速增长，这是因为石油价格增加，造成石油出口国的购买力增加所致。这一原因，加

上中东国家间经常发生冲突，造成在所有转让给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武器中大约有一半是转让给该区域的，其余的一半则相当平均地转让给南美洲和中美洲、北非、撒南非洲、南亚和远东和大洋洲。⁴⁸ 自1980年代初以来，国际武器转让的实值减少，主要是因为发生了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负债日增以及石油价格下降，无可避免地减少了武器的需求量。⁴⁹ 比起1970年代后半期来说，目前在军事需要和民用需要之间作出选择的问题是棘手得多了。虽然各国采取的决定不一，但许多国家都一并裁减了军事和民事项目。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输入武器方面已停滞下来，尤其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它们在主要武器输入方面所占份额逐渐减少。⁵⁰ 对于出口国来说，1970年代末期和1980年代初期轻而易举地销售的黄金时期已不复存在。

53. 不过，国际军火市场的收缩却有助于历来的主要军火供应国重新夺回它们先前的市场份额；这些份额从1970年代末期至1980年代初期一直在减少。传统军火供应国的供应逐年减少，而新兴工业化的武器生产国则逐年增加供应军火给其他发展中国家。目前已有的数据显示，这种趋势已经停止，除了一些例外情况之外，从198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趋势甚至已获扭转。有时候，涉及的军火是再出口品，购买自工业化国家，不过大多数军火来自发展中国家中少数的新兴武器生产国。⁵¹ 以实值计算，这些军火交易在1970年代的后五年每年约达5,000万美元，而在1980年代的前五年，每年超过20,000万美元。⁵² 其中一些新兴生产国的军火出口突然增加的原因是它们有能力生产坚固可靠的武器系统，例如装甲车和教练机，这些产品比起主要工业国家生产的技术密集的精密武器更适合当地环境。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足够的基础设施和技术人材来操作和维修技术先进的武器。这是为什么它们要从军火来源国聘请大量技术专家来执行这些任务。一句话，现代武器系统是一个不同技术文化的产物，往往不能不经过实际和观念上的冲击而移植到另外一个不同社会—文化的环境中去。

54. 无论如何，在1970年代末期和1980年代初期，军事装备的总需求

量大增。各国政府开始进行更新装备的方案，而非生产国则增加它们的进口。飞机工业尤其蓬勃发展。目前，这一情况正在改变。预算赤字限制着军事预算的增长，政府订购飞机和其他主要武器系统已显饱和状态。这一情况，加上的研制费用日增，促成单位成本增加，进一步减低武器系统的生产。这就是说，军事工业，特别是飞机工业，在未来数年间会面临一个重新调整的时期。集中的趋势将会继续，而军火承包商之间将需要加紧共用资源。这一情况，从国内和跨国两方面来说，都很可能发生。面对着这一情况，军火制造商实际上不可避免地必须将业务分散到制造非军用物品方面，将目标集中在一些特别的军事装备上面，和设法改变出口的结构。”

55. 主要的现代武器系统包含先进的技术，这一点表明了两个不同但相关的方面：只有少数国家能够生产并供应此种武器，而且这些国家必须出口武器来抵消它们一部分的研制费用。出口除了是出于技术和经济原因外，还有出于国内政治压力的原因，这些压力关联到军火生产业的就业问题或对外政策的目标。由于这些原因，许多政府不大愿意对常规武器的转让加以限制。

*
* *

56. 从上面对军备竞赛各方面的变迁的评价可以清楚看到，军备竞赛仍然是一个全球现象。从核军备竞赛来说，它仍然是对文明的威胁，从军备竞赛的各种表现来说，它是极端复杂的多方面的问题，危害世界和平与合作，普遍各区域各类国家加强安全与社会福利。尽管自1982年联合国专家研究报告过时以来，军备竞赛的性质点出了许多变化和新趋势，但上述的情况仍然没有改变。上述变化的其中之一是各国更清楚认识到，在当前主权国家的世界中，和平与安全的目标仍未达到，而每一个国家必须这样或那样地顾及其安全及其他需要。这就不可避免地促使这些国家政府作出慎重的决定，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军事安全方面还是用于民用优先项目上去。

57. 对核军备竞赛的重新评价显示出，核军备竞赛也许已达到了“颠峰”，从核武器的总数量来说，它现正开始慢慢地走下坡，不过仍然是危险万分。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签订的关于消除中程和中短程导弹的双边条约，以及两国正在进行的双边谈判、特别是两国设法在可以核查的基础上裁减战略性核武器的谈判，反映了上述的情况。不过，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例如，次级核武器国家质量现代化、横向核扩散的可能性和继续进行核试验等问题，仍然有待解决。

58. 军备竞赛的其他方面造成了下面的后果：

推进军事技术，因此使武器日益精良；

大大扩大和延长区域性武装冲突，伤亡一直增加并导致在冲突中使用化学武器；

增加技术先进、破坏力日益增加的常规武器的成本和扩大这些武器的散布范围；

导致各方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和发展工作；

妨碍经济增长、影响国际的债务以及社会发展和人类福利改善的可能性；

改变军火工业和武器转让的格局。

这些情况并没有获得任何明确的实际改善。但在1980年代中期，所有这些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有些方面取得了进展，另一些方面则发生倒退。不过，军事上争取现代武器和政府销售这些武器的意愿并没有改变的迹象。

59. 例如，在全球范围内，以定值美元计算的军事支出一直在增长。在一些地方，军事支出下降，主要原因似乎是因为经济衰退和债务情况恶劣而不得不这样做。军事研究和发展以及其促成的技术进展继续从民事活动中挪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至少在短期内，大大增加了武器的单位成本。这样又转过来更加刺激出口，以便增加生产的数量，减低研制费用增加所造成的影响。除了冲突地区和私人进行的买卖外，武器转让虽有所减少，但促成这项变化的原因也是经济因素大于国际关系获得改善的因素。总之，必须指出军备竞赛具有自我存在下去和不断变动的特性。

第二章

资源和军备竞赛

60. 军备竞赛需要若干不同类型的投入，从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到尖端技术和财政资产。国家军事机构和个别武器系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混合利用这些投入。因此，对军备竞赛所占用资源的性质和程度进行任何概括都会有不确切的因素，都会需要不断重新评价。但是，军备储蓄显然是一个重要因素，在国内和国际上挪用资源，使其不能用于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由于世界资源大都很缺乏，民事和军事用途之间就不断争先使用资源。由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军备竞赛的性质不断变化，其对各种类型资源的需求并非一成不变。就现代武器的研制而言，技术和人应用技术的技能日益重要，而对矿物和其它传统自然资源的需求则相对减少。事实上，实验室已制造出成本更低和更经久耐用的替代品取代若干矿物和自然资源。此外，由于国家军事体制的特征因时而异，因而资源质素及其使用效率更形重要，其数量的重要性则日益下降。换言之，各国军事体制在紧跟社会的全面经济和技术发展。

A. 自然资源

61. 军备竞赛和军工生产耗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虽然对于军方而言，各个别原料并非同样重要，但正如上次报告²⁴所详细探讨的那样，毫无疑问，国家和国际资源系统与国家军事需求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然而，这种关系十分复杂，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会产生变化。对整个资源分配和消费的军用方面进行认真分析，就必须认识到资源的许多方面和种类以及资源的来源、成本、质素和用途——也就是构成资源系统的许多因素。在这样的资源系统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因素和生物因素与社会和经济组织和发展相互作用，而社会和经济组织和发展反过来又确实所应用的资源分配战略。而且，通过采取新政策，可以改变决定这些战略的资源系统社会组织。

62. 自然资源使用中的军用因素涉及绝大多数国家，是目前体系的一大特点。在这方面，尤其应该指出，各国国内和各国之间自然资源生产、分配和利用的安排存在着多层次关系，因此，自然资源蕴藏非常重要。各国资源消耗格局非常不平衡，不发达国家的消耗量一般非常低。”自然资源的军事利用更加强了这种不平衡现象，因为这种资源的消费非常集中，而许多资源的来源和生产更加集中。仅三个国家便拥有某一矿物一半或更多的已知储藏量、产量和出口量的现象并不罕见。矿物供应如此高度集中，这间接说明了为什么会出现出口卡特尔和其它销售和市场分配办法等形式的独家垄断现象和寡头垄断安排。”⁶⁶

63. 由于战略自然资源供应集中，使这些资源的消费国依赖其供应国。在对依赖问题进行各种分析时，往往强调高度工业化国家的弱点。据说由于这些国家必须取得战略自然资源以维持其军事领域的数量优势，因而这种依赖特别危险。在某些自然资源方面，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确实依赖国外来源，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现实日益明显。在这方面，苏联的资源蕴藏比包括美国在内的其它国家全面。实际上，据说苏联仅有少数矿物依靠进口。”⁶⁷

64. 然而，在战略矿物方面对国外供应的这种依赖现象往往导致得出夸大的结论，好象发展中国家已经控制工业国家的战略动脉。经过认真考察，才发现在整个约35种战略矿物范畴中，发展中国家仅在铝土矿、钴、锂、钶、钽和锡方面掌握着重大的控制权，也就是拥有三分之二以上战略上具重要性的储藏。⁶⁸此外，应该指出，仅少数发展中国家能够控制战略范畴内矿物的储藏和生产。实际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严重依赖自然资源进口，其依赖程度往往超过发达国家。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消费这些资源的水平低，因此无论是因为无力支付还是因为供应国出于政治原因不顾供应而造成国外供应中断，这些国家因供应中断而受到的影响尚未成为重大的国际问题。石油是唯一的明显例外。在石油方面，由于石油输出国努力争取提高油价，不产油的发展中国家比工业国家所受的影响更大。

65. 虽然多数国家过去都能在当地采到足够的煤，但石油自从被广泛用作燃料

之后，就必须从其它地区特别是从中东进口。由于联合王国以及稍后美国的工业成长日益依赖从该地区进口石油，因此，该地区被确认为具有战略重要性。多数工业社会在民用和军用方面都依赖外国石油来源，因此，它们更有必要保护这些来源和有关国际贸易和运输线，使其不受敌国的侵扰。现代工业社会对石油的需求大大地影响了海军战略和突出表现军事力量的其他方法。”许多发展中国家也高度依赖石油进口，但由于它们总的经济脆弱，军力弱小，它们很少为减轻困境而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虽然每架军事机器都依赖石油供应，但工业国家需要的绝对数量超过发展中国家所需绝对数量许多倍，因此，可能产生比较激烈的政治和军事行动。

66. 由于匮乏不可再生原料、能源和土地，造成了各种紧张局势和冲突。这种匮乏现象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的；是难以支撑的发展形式造成的。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指出，难以支撑的发展将各国逼到了环境的极限，因此，自然环境方面的重大差异或可用土地和原料的不同可能造成并加重国际紧张局势和冲突。⁶⁰现实中已有这种冲突存在。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冲突可能包含领土的一面，因为由于人直接依赖土地和水及其收成，使国家或次国家级的集团相互争夺。在许多内战和边界战争中，资源匮乏是敌对行动的一个促进因素。一般说来，工业国家之间没有因资源引起的相互紧张关系，或者说，无疑没有引起同样程度的紧张关系。然而，在它们的对外干涉行动甚至军事战略中，有时可以看出资源因素是其动机之一。这种干涉行动可能往往破坏而不是保障石油和原料供应。通过发展长期关系而不诉诸军事胁迫和干涉，可以更好地保证稳定的供应。然而，这并没有降低石油作为生产国或消费国外交政策中一种手段的重要性。⁶¹虽然国际资源竞争产生紧张局势，但很少直接导致跨越边界的重大资源战争。⁶²更常见的情形是，各国在国内与土著人民进行较低程度的冲突，以扩大石油和矿物包括铀的生产，或将生产扩大到土著人民世代相传的土地上。这种行动旨在图一己私利和保障供应，但可能威胁土著居民的未来和生态平衡。因此，民用工业和军用工业对能源和原

料的需求造成了复杂的连锁影响，即影响到国际体系制，又影响到当地社会。因此，出现了一个相互联系、跨越国界的资源体系。军事安全需要被用作论据，论证本国在这个跨国界的体系中保持控制地位的必要性。这种控制表现在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的各种政治和契约安排上，表现在储存政策上，以及表现在研制合成品和其它代用品上。

67. 前面已经表明，军事方面的自然资源消费必然要受到技术进步的影响。历史上，经济增长需要更多原料，以保持生产机器的运转。对原料的依赖和原料的使用程度与收入水平和工业化的历史时期和格局是相联系的。这意味着，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今后普通金属消费的增长速度比工业世界快，但铝似乎是一个例外，因为与其它金属相比，铝不容易由替代物替代，发达国家的工业也仍将需要铝。因此，今后许多年里，铝和其它轻质和特殊金属将吸引跨国采矿公司⁶³。军事工业也将出现这类消费格局方面的一般趋势。相对而言，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的军事工业将需要较少的重质普通金属，但需要较多和较多种类的特殊金属。各种关键金属的需求量不一定很大，但即使所需要的少量金属可能也很难得到。因此，自然资源的军事利用日益成为一个质素问题，其涉及的政治和战略问题必将比以往更加微妙。就某些金属而言，现在还没有确切的特殊金属生产和贸易统计资料。

68. 军事工业化的传统形式是依赖铁、铜、镍和钴等普通金属的供应。前面已经指出，这些金属的生产、消费和贸易很混乱，而且不平衡，从而引起了竞争和紧张关系以及保障不断得到这些金属供应的政治军事战略，由于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存在爆发资源战争的可能性，因而通常符合逻辑的做法是提倡保护、更加公平地安排和最好地利用自然资源，通过这些措施，使世界更加稳定与和平。⁶⁴ 诚然，这些措施仍然行之有效，但必须根据新的趋势得到修正。在建造武器系统方面有时重点转到使用稀有特殊金属，这种转移已经使以国家为基础的供应必要原料的战略不象以前那样重要。国际金属市场不稳定，这已经开始以新的方式影响军事工业

的经营。除其他事项外，其原因是，由于缺乏关于某些特殊金属的生产的资料，并且由于预期可获得经济利益，这些特殊金属已成为国际投机的对象。⁶⁵因此，制定控制供应的长期战略更加复杂：对于供应国而言，交易的货币价值也许很小，然而，对于一个工业而言，即使少量的某种金属在技术上也许是至关重要的。

B. 人力资源

69. 军事工业和机构通过雇用各种人力使用人力资源。军工部门雇用劳动力的程度很难衡量，对军方就业的影响进行国际比较问题更多。⁶⁶军事就业涉及若干类型的活动，从明显的应征新兵、志愿人员和现役专业军人作为军事工业雇员，到参与军事和发展的研究人员和工程师。因此，除数据不足和难以比较外，其涉及活动范围也说明为什么任何关于整个军事就业情况的估计只能说明大概程度而不能提供确切数字。因此，关于军事使用人力情况的这种估计很少能得到一致接受，但这些估计至少可以说明人力资源用于军事目的的程度，上一份报告估计，全世界约有7,000万人从事军事活动，其中包括300万科学家和工程师和500万产业工人。⁶⁷对军备竞赛占用人力资源的总规模进行这种估计基本上符合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最近的估计，即：全世界与军事有关的就业大概在6,000万人到8,000万人之间，劳工组织估计的产业工人总数较高，达800万至1,000万人，占全世界劳动力的0.3%。工业国家提供军用物质和服务的劳动力比率通常比发展中国家高，就前者而言，比率在总数的1.8%至2.7%之间。⁶⁸

70. 劳工组织研究报告指出，国防机构雇用的人数一般都很清楚。因此，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能够估计出1984年全世界武装部队总人数为2,900万，前5年为2,710万，前10年为2,590万。根据同一来源，1984年世界发达地区军人总数为1,100万，发展中地区为1,800万。1974年以来，发达国家的这个数字几乎未变，而发展中国家却增加了270万人。增加最明显的是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但相对而言，工业国家军事化的程度超过发展中国

家：1984年，武装部队占总人口的总比率分别为0.98%和0.49%，当然，国与国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最近十年来，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相对军事人力负担都略有下降。⁶⁹ 为更准确了解人力资源参与军事机构的程度，还应该考虑后备部队和准军事部队人数。对武装部队现役人员和后备人员进行比较也可以看出其军事职能和特征。大家知道，与其现役部队人数相比，欧洲中立国家的后备部队人数很多（估计为8倍），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和友好合作互相条约（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的现役部队几乎与后备部队一样多，分别为1:1.6和1:1.4。⁷⁰

71. 严格来说，根本不存在所谓军事工业，因为实际上，它依靠各国国内和国际生产体系的若干不同部门，但在军队或与军事有关的机构工作的政府国防雇员基本上可以与在私营或国营企业为军方生产物质和提供服务的雇员区分开来。可以通过表5说明一个主要军事国家——美国——的情形。

表5 美国与军事有关的就业情况，
1977—1985年（以千计）

	1977	1980	1985
武装部队	2,133	2,041	2,151
联邦文官	1,263	1,243	1,322
军工生产	1,913	2,214	3,207
共计：	5,309	5,498	6,680

资料来源：戴维·K·亨利和理查德·P·奥利弗，“国防建设：1977—1985：对生产和就业的影响”，《劳工月刊》，第...卷，第8期（1987年），第8页。

美国公共部门军事就业水平几乎没有变化，不过可以看出，1980年代前半期略有上升。但是，直接和间接为军事服务的工业劳动力就业人数产生了重大变化，

由于至少在在一定程度上美国产生的这些变化似乎在其它主要工业国家也可以看到，因此，这些变化值得进一步分析。1980年，美国军事工业就业人数达220万，联合王国、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意大利等国军火制造业的从业人数共达151万。⁷¹

72. 美国主要由于实施军事现代化方案，1980年至1985年期间，与国防有关的就业增加较多。相对而言，军事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率从5.3%增加到6%，在制造业就业人数中的比率从6%增加到9%。从绝对数字看，1980年至1985年期间，整个制造业就业人数几乎减少了100万，但军事工业就业人数增加了60万，因此情况得到缓和。所创造的就业主要集中在1980年代初经济衰退时民用订货大减的工业，如造船和航空。因此，这些工业和若干其它工业对军事合同的依赖大大增加。例如，在美国飞机和部件工业，与军事有关的就业1980年为30%，1985年增至60%，在造船业，相应的比例从50%增加到85%⁷² 这一资料表明，美国的这些军事现代化方案——以及毫无疑问在较低程度上其它国家的军事现代化方案——不仅增加了军事工业的就业而且还附带支撑了此一期间不景气的“烟囱”工业。

73. 从长远角度看，工业国家与军事有关的就业内部也发生了变化，这就是出现了从政府就业到与军事有关的工业服务业就业的趋势。在美国，在出现这种变化的同时，每10亿美元军事需求创造的就业人数从1972年的92,000下降到1983年的85,000（这里可顺便指出，与后一数字相比，每10亿美元非军事公共支出创造的就业估计达93,000以上）。⁷³ 出现这种劳动力密集程度下降的趋势是因为一方面与军事有关的行业（研究与发展）以及特别是满足军事最终需求的耐用品生产的生产力和技术密集程度提高，而另一方面，与军事无关的机构的政府就业劳动力密集程度却提高。在美国，1984年，48%的军事支出用于购买耐用品，而仅8%的非军事支出用于此项支出。因此，虽然耐用品在整个国内总产值中的比例下降，但在军事生产中的比例却继续上升。这意味着在美国经济

中，耐用品的大量生产比以往更加依赖军事支出。1983年，军事支出在总最终需求中的比例在耐用品方面高达10.6%，在服务方面达4.4%，但在建筑方面仅占1.4%，在非耐用品方面仅占1.3%。⁷⁴

74. 人们一般接受——但仍然只是个大概数——的估计是，军事研究与发展占全世界研究与发展预算的20%至25%，占两个主要大国军事支出的10%至15%。军事研究与发展对就业的影响也显然与此相似：在科学实验室工作的300万科学家和工程师中，约75万即25%的人的工作目标是军事性的。⁷⁵绝对数字和相对数字都极高，特别是考虑到这都是从受过最好教育和最有才华的专家中挑选出来的学者和工程师。

C. 技术

75. 技术是产生于发明的一种资源。技术是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作为一场重大的技术变革的一部分或结果，物理程序和工具的发展也会产生新的政治、社会和心理条件。从历史角度来说，技术变革已越来越具有科学性、复杂性并植根于各国劳动力的经济分工。在这一程序初期，由于运输和交通的新技术的结果，各种活动的地理和社会规模得到了扩大。与此同时，社会影响集中于少数几个中心，权力等级的形式也有所增加。长期以来，技术一直植根于国际行动权力的扩大和集中。⁷⁶ 军事技术是这一历史发展的一部分。殖民扩张和制控的各个浪潮，都是以当时最现代化的交通和武器技术为基础的。原子弹也是技术知识和组织的产物，它使权力和毁灭的扩大达到极致。

76. 发展中的新技术的军用和民用用途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关键问题。促进经济发展和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的最有效的方式，是将所有现有的资源都分配用于民用研究和发展努力，对于这一点，专家之间分歧甚少。然而，这种解决方法很少是可行的。由于国际上的限制和国内的利益，几乎总是必须将资源分配用于保障安全。因此，大多数国家在发展技术时，同时选择军用和民用用途。这一问题这两种用

途之间的关系的相对平衡和性质问题。在这方面，人们可以察觉到复杂的不同趋势。一方面，大国之间的军事竞争对武器系统及其部件的性能和质素造成了专门的技术要求。这种过于专门化和复杂化的趋势，导致只用于军事的技术和专门知识，这些技术和知识很少能在民用领域里应用。而另一方面，在军工业里，只有很少几项技术完全是军用性的。相反，问题是军事性能标准在何种程度上妨碍了将知识和技术从军用转移到民用部门。⁷⁷ 一项普遍的结论是：军事研究和发展程序的先进的专门技术、组织和筹资模式，对实现民用副产品的效益造成了重大障碍。军事研究和发展，特别是最新颖的军事研究和发展的保密，使这一问题更加恶化。⁷⁸

77. 在军事技术趋向于过于专门化和复杂化的同时，民用和军用技术可以相互转换。可以说，由于电子、电脑和通信业的进展，这种转换性已有所增加。例如，有人指出，军用电子学是一个很容易同民用部门形成牢固联系的领域，由于武器系统包括了较多的电子设备，生产武器同生产民用商品更加相似。⁷⁹ 在电子工业，1950和1960年代的技术进展的动力来自军事合约。在1970年代的消费电子学取得革命性进展之前，军用需求超过民用需求。然后民用市场的扩大起了降低价格的作用，并使军用和民用用途之间的关系比较对称。在电子和电脑业，军用发明常常是促进更广泛地应用同样技术的媒介。因此，在这类新工业，军用与民用之间的关系趋向于同比较传统的研究和生产领域有所差别。然而，不应当过度强调这一结论。军用技术仍然有若干特点—例如，必须有备用系统—使其无法同民用技术相互转换，在下列情况下就是如此：内装的冗余经专门设计，能够经受战斗损坏，在受战斗损坏时继续操作，并可在武器系统遭毁坏时，增加操作人员逃离和生存的可能性。此外，在这些新工业有迹象表明，军事当局由于对民用产品不满意，正在开始推行新的军用电子和电脑技术项目。⁸⁰ 事实上，特别是在主要的工业大国，军事情报和通讯正在依靠常常是专为战略用途设计的先进技术。这类通讯网同民用通讯是分开的，这不仅是为了提高其技术上的可靠性，也是为了提高其政治可靠性。因此，军事通讯正在越来越多地创造一个自身的隐蔽世界。⁸¹ 在空间及同空间有关的技术的许多方面，也存在着类似状况。

78. 对军事研究和发展的入力和财政资源的投资同各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并非没有关系。在世界的军事研究和发晨资金中，大国花费的份额不成比例。然而，如果认为各大国对军事研究、发晨和采购的投资是长期以来国内经济增长和衰退格局的一个主要原因则是不确的。但一般认为，研究和发晨的民用用途将在世界市场产生较大的商业利益。在适应新的市场状况方面，民用途径通常提供更大的灵活性，并在实行时显然纳入了价格及消费者喜好等因素。与此相比，国内和国际市场对军事研究和发晨的专门产品需求有限。如高度依赖这类技术，则预示一国将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相对衰退。但如以民用和可互换的民/军用技术为重点，则将为加强竞争能力和增加市场份额创造更好的机会。⁸²

79. 国际关系具有等级森严的性质，而技术水平和军事力量水平之间的明确的相互关系，就是这种性质的一个方面。在发展中国家中，只有半工业国拥有足够的资源和基础设施建设本国的军事工业。此外，如果不进口生产物质和技术知识，通常都无法建立一个国内军事研究和发晨系统和军火工业。因此，这造成了技术上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往往使任何国家的国内经济和社会体制两极分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是如此：不平衡发展的全球性趋势就此深植于各国的制度之中。⁸³若干军火生产国的政策都证明了这一点：这些国家的政策旨在增加军工业的国内成分，并将其更明确地建立在国内拥有的资源基础之上。依靠这种战略很少能够打入工业国军事市场——这些国家的市场本来就封闭的相当严——但却能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出口军火，因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常常更情愿要比较简单可靠的系统，而不情愿要主要军事大国通常出口的系统。许多发展中国家赞成进口而不是自产军火，这些国家承认，对于它们来说，一项以资源为基础的发展战略比一项以制造为基础的战略更加合适。一项以资源为基础的战略不否认建立本地资本货物工业的必要性，但这种战略的目的，是限制和控制初级技术方面的依赖和注重合理地利用国内人力和自然资源。⁸⁴有些国家选择了这一战略，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则走上了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前者可能会成为购买后者生产的武器的主顾。发展中国家正在出现劳动力的经济分工现象，这种现象将造成工业产品的国际交换新模式——这一方面包括武器，另

一方面包括自然资源——也并非不可思议。这种交换已经存在，但主要存在于工业国和石油出口国之间。

*
* *

80. 对军备竞赛利用资源情况的分析显示，军备竞赛占用了原来可用于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的自然、财政、人力和技术资源。由于这些资源并不是无限的，无论是在各国还是在国际上，都必须选择强调其军用和民用用途的程度。近年来，技术资源（包括人力资源投入因素）在军事上的重要性超过了自然资源的重要性。因此，军事部门同社会的整个经济和技术发展保持了一致步调。

81. 无论是在国家还是在国际范围内，自然资源同其军事用途的关系都是复杂的。这部分是因为具有战略意义的矿物，包括某些关键性的矿物集中程度不均。这同时导致产生了对外来物资的需求和供应者的垄断行为趋势。无论是在军用还是民用方面，石油对工业社会都特别重要，但是对许多不产石油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也是如此。不仅是石油，还有多种自然资源都具有稀少和不可再生的性质，这造成了紧张局势包括冲突，有时涉及当地人民，有时导致某种形式或程度的外来干预。但必须指出的是，某些矿物以前具有关键性，但已为其研制出现代替换物。例如，铝和少量的特殊金属仍然是必不可少的，这导致产生了投机金融活动。

82. 全世界大约有 6,000 万至 8,000 万人从事同军事有关的职业，1984 年，其中约有 2,900 万人在全世界的武装部队服役。在这当中，有 1,100 万人分布在发达国家，有 1,800 万人分布在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数目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同时，发达国家的军事化程度仍然较高，其军队雇用的人数占人口比例相对要高出大约一倍。军工业依靠国家和国际生产体系的许多部门，这在工业化国家需要大批熟练工人。然而，1980 年至 1985 年期间，政府非军事开支显然本来应当能够比当时的军事开支水平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些资金

回旧非军事部门后可以有效提供新的职业。此外，军事研究和发展消耗了约 25% 的全球研究和发展预算，并雇用了占同样百分比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83. 技术进展，特别是通过运输和交通上的发明而取得的进展，造成了新的心理、社会和政治条件。在这方面，致力于保障安全的军事技术并驾齐驱；就是说，各国往往同时发展军用和民用技术。因此，分配和副产品效应成了问题。虽然在许多情况下，军事需求的专门性妨碍了副产品效应，但并非在所有领域都是如此，电子业就是一例。关于所涉及的研究和发展，民用用途产生的效益更多，在整个世界市场尤其如此，这一点已显示出来。一个国家要开始发展军工业，就必须拥有相当发达的基础设施并进口原料和部件。对现有生产国的依赖性由此而生。重要的新的军火生产国的数目虽不多，但正在增加，其中有几个国家的目的是逐渐增加其产出的国内成分；这些生产国经常能够向发展中国家出口耐用可靠的低技术军用产品。这些因素正在导致武器方面新的国际贸易模式。

第三章

军事开支和社会经济发展

A. 一般考虑

84. 裁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久获广泛承认，许多专家认为军事开支和发展之间也有解不开的关系。然而这些概念必须加以说明，因为一些专家认为只有在安全环境下才会有持久的发展，这就需要适当而非过分地建立防卫。该学派认为工业化国家的裁军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没有直接关系或运作关系。第一个提到的关系是最常提到的，在短期和长期方面都认为是积极的：倘若国家和国际的安全得到保证，则裁军节省下来的资源可用于推动社会 and 经济发展。高级别的军事努力从备选的民事用途吸收了稀有的资源，裁军可以轻易地提供一批新的资源，这如非裁军是得不到的。后一种关系被认为大部分是消极的，特别是长期而言：大量的军事开支被认为破坏成长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因而促使经济停滞。即使军事开支短期会在经济上作出积极贡献，但一般而言不象多数民用公共支出积极，它在经济上产生的影响差不多必然是消极的。

85. 这些消极的结果简明地载于裁军和发展关系国际会议的《最后文件》：“连续不断的军备竞赛所吸收的世界的人力、财力、自然和技术资源太大了，对各国经济造成沉重负担，影响贸易、财务和技术在国际上的流动，此外还妨碍国家间建立信任的过程。全球的军事费用与经济和社会发展不足以及人类有三分之二以上人类生活贫困悲惨的现象形成强烈对比。因此人们共同关心的是寻求较低级的军备所提供的安全，以及设法减少这些支出。””

86. 人们就军事努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作出结论时必须小心。这种关系每个国家集团不同，长期以来每个集团内也不同。一般性分类——诸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市场经济和中央计划经济——对于将国际系统分散为分系统有帮助，这

样可以适当地细查军事化和发展之间的关系。但是这种分类仍然很粗略，而且各种类别的国家间内部可能有很大的差别。此外，利用若干不同的指标可以使“军事努力”和“发展”这种总括性概念变成实际。就发展而言，投资、经济成长、社会经济平等和基本需要的满足等指标都可以利用。这种变数与军事努力的指标的相互关系产生一套结果，其差异范围可能很大。如果照顾到这些说明，那末任何关于军事努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结论在解释时都必须慎重将事，并适当地照顾到来龙去脉。⁸⁶

87. 军事开支的数据通常不够准确，无法用来作空间与时间两方面的可靠比较。因此，它们不能令人满意地表明军力，不论是武器与人员，也不能衡量军事部门对经济的影响。为了填补这种数据的不足，有人提出了一些指标，用以衡量上述事项。有些指标是根据军人的数目，其他是根据军事开支在国家生产毛额中的份额。生产毛额的方法尽管存在着各种缺点，可是在目前看来是粗略比较个别国家的军事负担上比较可取的指标。⁸⁷

88. 传统经济学上对这个指标的解释得到了机会成本的分析概念的支持。军事开支的机会成本指的是：为了替国防创造一额外单元的开支，必须放弃多少单元其他方面的开支（如教育、保健或社会福利）。这种思考方法必须事先假设，军事开支与其他开发是可以互换的，一方面的增减是可以另一方的减增来计算。这个方法有不同的用途。一个最简单的用途就是应用在政府预算中对不同种类的开支的决策上，如果这些开支可以被视为能够互换的话。这个方法可以用来审查，如果把某一个数量的军事开支改用在社会目标方面时，可以获得多大的好处。

89. 要想大体了解如何将资源总额分配于军事目标和通常认为重要的特别非军事目标的一个很概略的说明，可以研究下面本国政府对各种目标的预算在统计上的细分（见表6）。

表6. 政府的军事、选定的非军事和其他目的的
 预算按百分率的分配情形^a

	防 卫		社 会 安 全		卫 生		教 育		其 他 目 的	
	1978	1984	1978	1984	1978	1984	1978	1984	1978	1984
工业国家	13.5	15.0	37.7	36.8	11.2	11.5	5.1	4.0	32.5	32.7
发展中国家	15.4	13.4	16.1	16.1	4.4	4.2	10.8	9.8	53.3	56.5
世界	13.9	14.6	33.3	32.6	9.6	9.8	6.4	5.3	36.8	37.7

资料来源：数据出自《政府和财政统计年鉴》，第10卷，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1986年）。

^a 应当记住，由于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全球国产总值同时波动，因此上下百分之一的变动不一定表示相应的绝对变动。

因为已经认识到这种说明很笼统，它说明的区分很粗略，必须归入右手一栏的方案和活动种类太多，因此对任何详细的分析都没有用处。然而，关于它的一些意见值得注意，也似乎证实其他资料来源的可靠性。1978年至1984年工业国家的军事拨款相对而言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相对而言却减少了。此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1978—1984年军事支出是否取代或补充社会支出。看不出一个断然的答案，因为政府总预算中的任何变动会影响军事支出和社会支出之间的分配办法。但是有人认为在工业国家可能存在一种交易，这种情形在发展中国家则看不出；在发展中国家，军事负担相对减少的结果并没有使社会、教育和卫生支出相对地更加受到重视。而是其他方案相对地更加受到重视。进行更详细的研究以后，发现军事支出对满足基本人类需要有害影响的倾向，但是这种倾向也不是不变的。⁸⁸人们也必须记住，社会目标——诸如保健、教育和住房——也可以从减少军事领域以外的支出来实现，如减少低优先的政府项目和私人消费的支出。

B.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90. 关于军事支出是助长或妨碍经济成长的关键性争端现在已经大部分解决了。对大多数国家而言，在军事支出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有一种抉择办法。⁸⁹虽然军事开支最初的目的是满足国防需要，可是最近的研究证实：军事支出一旦获得政治优先就会刺激需求，从而刺激某些经济体系中与军事有关的就业机会和其他经济活动。然而，防卫的预算机会成本经过长时间以后会变得更大、更明显。例如，短期而言，如果能力过多或需求不足，军事支出就因产生所需的有效需求而可能发生多重作用；但是长期而言，由于它排挤生产性投资，因此会大大地妨碍成长。⁹⁰探讨军事支出的机会成本有两种方法，一是看各国的情况，另一是看个别国家长期的发展。这两种方法会产生不同结果。

91. 长期以来对工业国家的分析指出在若干时期经济成长与增加军事负担是一致的。⁹¹但是，军事支出和经济成长之间的这种研究的不利方向仍然不清楚，此外在个别国家的经济成长和军事支出之间的关系上有许多导致混淆的因素。⁹²

92. 关于各种工业国家军事支出的长期作用的若干研究展示并着重显出生产投资的极端重要性。通常军事支出对制造产出有积极影响，这是因为政府为军队购买资本货物。另一方面，例如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经合发组织）的成员国在战后大部分期间军事支出一直是高的，投资则是低的。此处可以假定高的军事努力和低的投资之间有因果关系，因为军事支出必然使可用于投资的资本数量直接减少。下降的投资率损坏经济成长的基础，导致经济成长减速。另一作用是军事生产倾向于吸收可用来推动出口带动的成长的资源。因此在军事支出与推动生产能力——从而推动全盘经济成长——的那种投资之间存在着代替作用。⁹³一方面为军事支出和投资之间的消极关系，另一方面为资本形成和聚集的经济成长率，对经合发地区的大多数国家而言显然是正确的。⁹⁴

93. 军事生产的投资和民事发展之间的替代作用也存在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中。

由于它们需要加强防卫基本建设和维持可靠的经济、科学和技术平衡，因此必须在经济上作出巨大的努力。其影响是将资本资源分配于发展工业的军事部门和建立与维持一个工业、科学和技术基础，以保证复杂的、技术先进的现代武器系统的生产。因此它们的军事方案带来比较沉重的经济负担，依照它们自己的研究，在战后大部分期间将人力、财力和自然资源从生产性的使用取走，缩小了对平民部门的投资。”其他研究注意到这种交易对各种消费者方案的影响，特别是对住房建筑和耐用消费品的生产，这两者都受到妨碍。但是也注意到在典型的中央计划经济，社会安全制度受到切实的保护，可以不受军事支出方面的波动的影响。”⁹⁶

94. 虽然在发达国家现在汇集的经济资源缓和了军事努力对福利的不利影响，人们常常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军事支出的影响不仅较大，并且对福利比对成长的影响更严重。”另一方面，上面讨论的军事支出的机会成本的边缘概念不是取决于本国收入水平。这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不管它们当前的发展水平如何，所有不断设法维持或加强其军事力量的社会都预先占用原来可以用于社会生产目的的资源。”⁹⁸若干关于发展中国家在军事支出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经验研究证实了这种看法。但是，军事支出和经济成长间的关系因这些国家的发展水平而异：对收入最高的国家而言，这种关系甚至可能是良好的，而对中收入和低收入国家而言，这种联系逐渐恶化。”军事支出当作公共支出的一种，其积极的短期结果来自现代化的努力，包括技术进展和创造新的需求。但是这些作用常常因为在其他方面造成消极拨款的军事支出而被遮蔽。它不利地影响储蓄率，结果削减对于成长和发展必不可少的投资。¹⁰⁰因此在军备竞赛的影响中的关键机制，就是窒息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投资，明显地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95.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军事支出的稍微变动是由各种因素引起的。其中包括国家卷入内战或对外战争，这对于军事负担有明显的影响。军人统治的政府，其军事支出也似乎高于民政管理的国家。¹⁰¹不论是什么理由，高军事支出的长期机会成本差不多必然是消极的，不利的分配影响经过长时间不能由任何种积极

结果抵销。但是这有很大的国家和区域的变化。¹⁰² 高水平的军事努力在预算上的机会成本在因其他理由也经历经济危机的国家中显然是最高的，因此无能力负担军事方案导致的额外费用。

C. 对人力资源的影响

96. 军事部门的就业不是解决失业问题的有效办法。不过，军事开支和就业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只有置于适当的背景之下才能充分了解这种关系的含意。这方面的困难在于，各国和各行业的情况差别甚大。为军事部门的就业作出定义这件事本身就不容易。除了军事机关本身的就业之外，还必须考虑军事——工业方面各种形式的就业。例如，注意力不仅仅应当放在主要的军事承包商身上，因为忽视分包商将会扭曲真相。一般来说，分包商和零部件供应商雇佣的工作人员比主要承包商雇佣的人员专业和技术水平要低一些，但雇佣的人数更多。¹⁰³ 这种情况并不因独立承包商退出国防市场而改变，至少在美国是这样。主要军事承包商已设法通过垂直一体化——即对分包商进行直接控制的方法——抵销了这种趋势。主要承包商还增加了零件的国际来源，特别是那些可由标准化程序生产，因此可由技术水平较低的工人生产的零件。¹⁰⁴ 包括分包合同做法在内的军火工业的多国化使得直接衡量军事生产对就业的影响进一步复杂化。今天，武器系统是各国和各国各经济部门的人力、资金和技术投入的综合成果。在跨国公司的主持下，与军事有关的就业正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不过，关键的研究、开发和生产过程仍受到国家的控制，尤其是涉及重要技术的地方。¹⁰⁵

97. 一般来说，国家研究报告提出的证据并不支持这样一种看法，即高军事开支并不一定有利于充分就业。相反，由于削减了劳动密集部门的公共开支，军事开支可能增加失业现象。这是因为同其他就业方式相比，军事开支的趋势是提供较少的工业就业职位。通过注意个别工业或区域乃至具体武器方案的比较具体的模式来探索这种交易可得到最佳结果。¹⁰⁶ 了解军事开支对就业的影响的一个具体方式是将

该问题同转换问题（即下文讨论的军事工业转产民间用品和服务）更紧密地联系起来，这种转换不仅是国家关注的问题，而且是地方关注的问题。另一方面，普遍削减军备和武装部队可节省资源用于民用目的，方法是，或者通过国家预算重新分配资源，或者减税，通过私人投资和消费创造就业。

98. 关于生产的最终目的，与民用相对应的军用本身并不决定对就业的影响，对就业的影响取决于其他因素。依赖国防的工业（如造船和军械工业）同不依赖国防的工业（如汽车生产）相比。可能创造出同样多或更多的就业机会。其原因正在于此。但一般的趋势是，依赖军事订货的工业就其每一投资单位来说，雇佣的人数较少。其原因因为两种不同的因素。在主要工业国家，首先，从政府在武装部队和军事行政机关的雇用就业转变为在生产军械和军事服务方面的雇用就业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相对的就业效果。因此从就业的观点看，从政府工作职位转移到工业和其他有关职业减少了就业机会的数量。但是根据第二项因素，这种转移会创造工资较高的职位和其他享受优惠的工人和专业人员群体。换言之，与军事有关的职位对总体就业的重要性在于它减少了相对的就业。它还可能使就业变得更昂贵。¹⁰⁷

99. 在军事工业各行业同在民用工业各行业一样，就业效应取决于生产过程的技术和资金密结的程度。工业化的时间是一个因素。在造船和冶金这些老工业部门中，军事生产可能具有保护工作职位的作用。政府为军事订货提供资金可能有助于这些工业生存下去。否则，在生产率和效率方面的国际竞争可能损害并最终摧毁这些工业。另一方面，这种出于政治考虑分配资源的做法可能推迟具有竞争性的新工业部门的出现，而这些新部门需要合格的工程师和一支熟练的劳工队伍，以确保民用市场不被外国竞争者占领。因此，将宝贵的资源用于军费开支而产生的结构影响确实可能对主要工业国产生不利后果。这种军事开支可能对投资和技术政策产生长期的消极后果，从而间接影响生产率的增长。¹⁰⁸

100. 一般来说，技术和知识密集的军事工业，包括生产飞机、通讯设备和导弹在内，就业要求最小。¹⁰⁹ 同“烟”工业相比，这些工业是新兴工业。从老的工业转到新兴工业可能造成就业问题，这个问题可能会由于军事生产强有力和仍然不断增长的选择新技术的趋势而加剧。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其他公共支出的就业要求从数量上说高于军事开支的就业要求。¹¹⁰ 从军事部门节省资源将会改善而不是削弱国家劳工队伍的就业，其原因正在于此。不过应铭记，按区域和行业来说，军事就业是相当集中的。在努力将劳工队伍从军事活动转往民用活动的过程中，这是造成实际障碍的又一个因素，虽然这些并不是不可克服的障碍。但是必须正视这些障碍，因为军事工业中的结构变化和削减军备协议都要求采取重新调整的措施。在这方面应当铭记，在市场经济国家中，在创造新的公营部门就业机会方面政治有其局限性。如果扩大公共部门的就业从政治上说不可取，则必须在新兴工业部门或在仍然需要更多劳工的服务部门另外创造就业机会。最合理的安排将是，将高度熟练的劳工队伍从军事工业转移到先进的民用生产方面，这样做不仅直接有利于全国的经济，而且有利于提高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从而产生长远的利益。

D. 对技术的影响

101. 在民用航空、电子、计算机科学和空间研究部门及民用化学和生物领域取得的技术进展显然具有军事上的用途。从这个意义上说，民用技术的发展无疑对军事工业有广泛贡献。在目前情况下，如果没有民用的研究、发展和生产的基础结构，研究和发展的军事应用实际上是不可想象的。大多数民用技术是具有双重用途的技术，因为它们也在军事部门也具有潜在的用途。

102. 同样，显然存在相反的对立关系，但情况比较复杂一些，因为许多军事技术具有明确的最终用途，不那么容易转为民用。传统上认为这种情况显示军事研究和发展的附带作用很有限，有时根本没有作用。¹¹¹ 这个结论显然有道理，但在目前情况下可能必须加以修订，主要原因是工业产品中最近普遍出现的电子技术、生

物技术、化学工程和其他新技术。所有现代生产系统都必须运用这些领域的成结，因此往往使某一特定技术的民用和军用之间的界限模糊起来。¹¹² 也就是说，这些技术的区别在于其最终的目的，而不在于其内在的技术特点。

103. 因此对军事研究和发展的附带效应的任何讨论必须区别民用技术对纯军事产品和对双重用途技术的贡献。后者与比纯粹的军事研究和发发展努力比较，显然已经将更多的结果扩展到民用部门。此外还需指出，只泛泛确定军事目的的大规模探索性军事研究和发发展项目比起在严格的范围内确定的武器系统研制工作，可能具有较多的附带作用。¹¹³ 附带作用这一问题有两个不同方面。首先是具体方面，即从发展个别武器系统中获得的技术知识被转为民用。其次是附带作用的一般方面，这一方面必须留待各别国家自己判断。归根结底，问题在于，国家的技术发展方向是由国防需要而定，还是由发展需要而定。各国的各项研究表明，军事、空间和核工业增长的部分原因是现代技术全面增长的一个未曾预料的结果。不过，在这些工业的扩展中显然有一种政治和军事因素，决定这种因素的是公民的福利和社会改善以外的需求。¹¹⁴ 在充分确保各国安全的前提下，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将用于军事研究和发展的资金集中用于民用目的，改善社会和经济基础设施，保护环境，节约非再生资源，提高公民个人的福利和自由，这样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的需要。

104. 如主要国家进行的那种军事研究和发发展已从小型的发展项目扩大到可消耗数百亿美元的超级项目。这种超级项目集合数种研究机构和数千学者和工程师，进行一项具体的武器系统研究，或进行一项泛泛的军事概念的研究。人们对这种超级项目的社会和经济利益进行辩论。这些项目的支持者举例辩护说，第一章中概述的战略防御计划的成果转为商业用途，用来扩大市场并为许多工业产生利润。因为国家为最密切地参与各超级项目的公司注入了大量资源，所以这些项目在短期内有利于这些公司，对这种情况人们很少有疑问。

105. 军事项目产生的大规模全国性后果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如人们所正确指出，军事上的保密妨碍了技术知识以及军事领域向民用领域的有效转移。此外，军事研究和发展将其主要重点放在一项技术的性能之上。前面已经指出，性能标准和后备能力的需要在军事环境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一种武器系统必须竭力超过敌对的系统，必须比敌对的系统更适应生存，但是这些标准的要求在民用消费品市场上只是一个次要问题，在民用消费品市场上价格是一项主要考虑。¹¹⁵

五. 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106. 常常有这种假设，即军事开支是通货膨胀压力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军事开支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运用通货膨胀的三个基本概念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三个概念是：成本促起的通货膨胀，需求引起的通货膨胀和货币通货膨胀。由成本提高型通货膨胀的理论假设，军事生产具有自动使通货膨胀率升高的特点。特点之一是军事市场的垄断性质和通常采取非竞争性的签约做法，这就使大军火制造商有机会索取公开市场无法承受的价格。¹¹⁶ 武器技术在国际军火市场上的成本迅速上升，这也具有通货膨胀的性质，既有军事工业结构上的原因，也有质量方面的军备竞赛的原因。这表明，成本提高型通货膨胀的另一项原因可能是在评价武器技术和决定是否采购的时候主要考虑性能标准十分普遍。但是人们必须铭记，发展新武器系统固有的生产成本的增长并不等同于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意味着同样的货物一年比一年昂贵。军备竞赛的动力是生产与以前的武器不同而且更为先进的武器的原因。虽然这是实际上的产品改善，但是在对手进行军事竞赛的过程中对性能和技术质量的强调使具体武器技术的成本不断上升成了进一步的问题。这些相互关联的因素几乎肯定使与新方案有关的成本变得昂贵。¹¹⁷

107. 如果在增加军费的同时没有相应减少其他官方或私人开支，尤其是在生产能力已充分利用的时候，将会出现价格水平上升的压力。有证据显示，在某些时期，在军费上升的同时并没有增加税收以减少私人支出，也没有削减其他方面的政

府开支。在做出必要变动之后，这种做法通常导致通货膨胀。同样情况是，高额军费通常是财政赤字的部分原因，但这种赤字不是靠国内储蓄来弥补，而是靠增加货币供应或资本进口来弥补。增加的货币量随后不可避免地迫使物价上升。通货膨胀的需求压力和货币两方面具有非常普遍的性质，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支出，不管是官方的还是私人的，军事的还是民用的支出。

108. 在工业化国家，无论是按各种通货膨胀概念衡量，还是以生产系统中产品质量改善的角度看，军事部门的生产费用增长速度高于经济整体中这部分费用的增长速度。这就造成了具体的军事问题。这些问题加上对军事性能的强调，就不可能生产和以前同样数量的飞机或任何其他高技术武器系统。从数量上说，以飞机为例，制造每一代飞机的方案成本都高于上一代飞机，并且新一代飞机的数量少于上一代飞机。这是一种难以避免的困境。一方面，如所指出的那样，军火制造商一直努力通过增加武器出口的方法至少保持某些规模经济。在1980年代，由于发展中国家对武器的需求下降，这样做越来越困难。¹¹⁸ 除非在经济的其他领域重新组织或削减开支，否则难以抵销军事生产成本的上升。但是执行这些解决办法并不容易，这或者是因为存在政治障碍，或者是因为人们认为在经济形势已经恶化的时候减少就业和消费从经济上说不合情理的。

109. 根据以上各段叙述的论点，事实很明显，如果各国在增加军事开支的同时不在经济的其他部门采取补偿措施，那么就会产生通货膨胀压力。¹¹⁹ 此外，新的武器系统的生产成本上升趋向于推动总的通货膨胀进程。对某些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来说，有证据表明，在某些时期，军费的增长是直接造成通货膨胀的因素之一。但也不能说这是通货膨胀进程的唯一原因，因为在个案基础上，不可能同不存在军费增长的情形作直接比较。

F. 金融流动和债务的影响

110. 最近几年预算赤字的上升已成为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中心问题。这些赤字的产生有多种因素，包括变化多端的货币市场、世界市场石油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的波动和国内经济政策的变化。很多国家的军事方案并未形成预算赤字增加的一个中心因素。但是情况因国家而异，不能简单地判断。主要军事大国的一些例子表明，大规模的军事方案加上宽松的税收政策导致了财政危机。这说明了政府政策的重大失调。从长远来看，这些赤字不得不靠国内和国际的债务来弥补。

111. 发展中国家的多数债务则要靠外部资源来弥补。从1970年代中期以来，这些资源往往更多地靠国际私营银行，而不是国际公共组织共同提供。对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来说，筹资弥补赤字产生了通货膨胀的压力，这一压力反过来又引起向国外借款的进一步需要。国内军火生产为了达到起飞点，需要向基础设施注入大笔公共资金和发展武器系统。这就是易于产生预算赤字的原因。武器进口反过来又引起外贸逆差，从而进一步需要借款。特别在国内军火生产早期，仍然需要进口武器。此外，武器生产国不得不到外国采购国内供应者无法提供而在生产过程中必需的中间投入。尽管这两类军事活动武器制造和武器进口，根本不是造成外债的主要原因，但是它们却使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因此，进口量大的军火生产和军火采购增加了外债负担，并占用了宝贵的资源，使其不得作一些其他可能的用途。

112. 70年代主要靠供应国贷款才扩大了军火的销售。从此以后，主要供应国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成了世界军火市场的特点。有些供应国为了在竞争中取得成功，向最有利的东道主提供多达50亿美元的大笔出口贷款。到七十年代末，发展中国家一半以上的军火进口是用出口贷款支付的。有人认为，军事贷款的机会成本占发展中国家实际总债务的20%至30%。如果不提供军火的话，到七十

年代后期按照这一比例的债务转移净额就会小得多。¹²⁰ 可用这一数字与另一估计作比较，即1972—1982年累积的全部军事债务达860亿美元，占发展中国家1982年全部债务的15%左右。债务加深的原因是因为军火转让贷款七十年代每年为20至30亿美元，到80年代初则已增加为100亿美元左右。¹²¹

113. 庞大的军费也可能产生结构性的影响，较间接地促成外债的增加。军费造成投资和研究与发展活动减少，从而破坏了国民经济战略出口方向的基础。由此产生的畸形经济只能靠进口资本来维持，也就是说用这一资本来弥补政府的赤字和支持搞活出口经济的努力。换句话说，预算赤字趋于减少私人投资可得资源，若要维持这一投资，外债就会增加。在这两个例子中，最终结果都是增加外债，只是一个使出口情况进一步恶化，另一个则是直接了当地增加向国外借款。因此军费作为预算赤字的一部分损坏了改善由它们本身造成的经济困境的努力。¹²² 这一结构性困境和解决这一困境的努力尤其为靠工资为生的人造成社会代价，他们甚至会动员起来，反对政府同时实行紧缩措施。换句话说，平民执政的政府解决外债危机的努力可能会因为这类紧缩措施产生社会影响，而造成政治动乱，而难以从军人政府过渡到平民政府。¹²³

114. 靠外债采购军火在各国所产生的影响也大不相同。对有充足外汇的国家来说，军费开支不一定会极大地限制民用公共支出和经济增长。相反地，对外汇不足的国家来说，建立和维持可行的军火工业则受到很大的限制，只能靠越来越多的债务来维持。此外，这些国家是否有资金进行投资，是决定经济能否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¹²⁴

115. 那些经济战略以出口商品为基础的国家对外债产生的压力尤其深有体会。八十年代的债务危机与八十年代前半期商品价格下跌和利率上升是有关系的；为了赚取外汇偿还债务，商品出口国已使国际市场出现饱和，尽管需求已处于停滞状况。此外，它们在设法扩大出口时面临日渐抬头的保护主义措施，甚至连使用同一战略

的国家之间都产生出口竞争。虽然债务国可能已出口更多的商品，然而它们的出口总收入也许还是减少了。因此债务危机已使商品问题进一步恶化；同时它也使解决此问题的国际行动受阻。¹²⁵ 在此种情况下，那些试图用商品出口外汇购买军火的国家就面临极其严重的结构性调整和偿付债务的问题。这是它们最近减少军火进口量的原因之一。

116. 国际信贷压力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从工业国到发展中国家间军火转让减少的原因。由于外汇资源不足而难以维持这么大的武器和军用设备进口量。一些分析的结果表明，为克服这一障碍，贸易伙伴进行各种补偿贸易。但是喜欢采用易货贸易并非完全是因为外汇不足，它也许还反映政府的坚定政策是不论外汇资源是否充足，都愿意进行补偿贸易。事实上，喜欢采用补偿贸易的原因是它往往能培养买卖双方¹²⁶在政治、经济和技术上的共通性。但是总的说来，许多债务国由于重新建立民主政权而重定优先次序，对它们来说，军火进口量的减少是一种积极的发展。

117. 当地的军火生产和武器进口为该区域带来了外债，但主要原因并不在此。这种原因包括某些种类的资金进口数减少、一些国家外流资金数增加、利率偏高和偿还债务本身的开支很大等。1976 - 1983年间，仅仅拉丁美洲国家就为偿还外债支付了\$1,730亿。¹²⁷ 1982年是拉丁美洲财务状况的转折点。1973 - 1981年，拉丁美洲经济资源转移净额为\$102亿。1979 - 81年纯资源转让仍是正数，占出口价值的13%。但是1982 - 84年资源负转让徘徊在占出口的25%左右，耗尽了南美大陆的经济资源。1982年拉丁美洲的资源转移净额为负数，共达189亿美元，1983 - 85年每年增加到300亿美元左右。¹²⁸

118. 拉丁美洲国家政府面临的这一重大问题由于正赶上国内外的稳定和调整政策而变得更加严重。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克服通货膨胀和衰退而造成的内部不平衡的努力已过渡到立宪政体的进程联系起来。国内经济恢复稳定是伴随着这一过渡

而出现的重要现象。但是在执行时又受到必须克服由国际收支逆差引起的外部不平衡的外部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本应逐步重新分配资源以减缓外部不平衡，可是国际经济机构却要求迅速采取措施削减公共开支，特别是社会方案开支，债务国政府若无其他可行途径的情况下也只好尽力执行。¹²⁹

119. 与中东相比，拉丁美洲武器进口的负担则较轻。事实上在过去20年左右，中东国家一直是首要的武器进口国。石油收入或对外军事援助有助于该地区的国家继续进行大量的武器采购。但是80年代后半期中东国家的石油收入减少了，武器和其他先进技术的进口能力也随之下降。换言之，武器进口再也无法不使经济受到损失。但是海湾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是靠外部筹资维持的。

G. 对社会文化情况的影响

120. 一般的技术革新，特别是军事工业方面的技术革新产生了新的社会、政治和心理条件。因此不能将技术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结构分开。要想建立现代化的武器系统，需要作出重大的经济和组织安排，从社会很多部门汇集资源。在这些武器项目的执行过程中很容易形成自己的特点和理由。这就是往往难以放慢这些项目的发展或停止这些项目的原因之一。

121. 主要武器系统是进行军备竞赛国家现有技术文化的表现形式。军事大国的情况尤其如此。工业和技术进步的思想渗透在很多寻求现代化的社会的公共文化和政策中。在工业社会里，先进的军事技术被看成是现代化和进步的表现。¹³⁰然而同时，这些毁灭性的技术系统又是现代化矛盾面的体现。被认为是合理和慎重的既定安全政策由于破坏了国际和集体安全的安排而往往产生不合理和不慎重的结果。产生这一矛盾的原因是在新武器的影响下，国家安全与全球安全之间出现了紧张关系：“各国以其公民的名义用现代军事技术寻求安全越来越意味着全人类会不安全……越是以各国公民的利益来衡量安全，全球居民就越会受到损害。”¹³¹

122 国家提供的安全是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武器系统得到持威慑思想的人的肯定，对他们来说防御性武器既是为了报复又是为了直接保卫国家领土。另一方面，作为国家权力和威力象征的主要武器系统还发挥着政治作用。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军事项目显示政治价值、意图和目标，其他国家对此都有其不同的看法。由于文化和政治因素，认识的分歧使国家间的军事关系增加了不明朗和无法预见的因素。此外，政治领导人和普通老百姓之间也会有这类认识分歧，因此就会出现公开辩论，甚至示威游行。

123 事实上，有关发展和部署现代武器系统的决定往往是惹起争议的国家议题。它们在国内既得到支持，又引起反对；它们既使有关的国家团结，又造成它们的分裂。这种矛盾反映了在寻求军事安全和鼓吹和平之间出现的历史对立。这两种观点同样可看成是对不安全的反应，都主张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消除这种不安全的状况。综观历史，对暴力和不安全的首要反应就是加强政治和军事机器，即国家，以保护公民不受内部动乱和外部威胁。

124 在当前的历史阶段，人们越来越想知道国家能否在远程核武器时代提供确保国家领土及其居民安全的充分基础。核武器突出表现了拥有保护国家安全的手段与对国家安全形成实际挑战之间的差异。已经重新确定了国家在提供安全方面的中心作用，从而为减缓这一困境作出了努力。同样，一些国家已将威慑思想——特别是核威慑思想——作为保护国家安全和向人民保证这种安全的可靠性的关键手段。然而在许多国家，人们对这一满足安全需要的解决办法产生很多疑问。对舆论的调查表明，公众舆论分成两派，一派认为安全问题主要靠威慑和防御能力，另一派则将其说成是裁军、发展和对人道主义的广泛重视。这两种意见并非总能说到一起，实际上它们彼此间越来越多地发生冲突。

125. 这一冲突以多种方式在传播媒介、公开辩论和教育中出现。传统上安全与人类群体通过国家形成一体。根据其特点属于国际和次国家级不安全的新形式使这种一体形式成了问题，从而对威慑思想的效率和以国家为中心的安全政策的整个概念构成挑战。消除这一矛盾的一个方法就是更全面地确定安全概念和重新确定国家安全的概念。在重新确定概念时既要考虑传统的和与军事有关的安全利益，又要考虑对以国家为中心的观点的新挑战。这些问题还具有其心理因素；军备竞赛既会产生焦虑的心理，又会产生抗拒心理，既会出现逃避现实的心理，又会出现反抗行为。生活在核武器时代，不论它们是为了威胁还是为了保护，都给个人在不安全的经历上增添了全新的因素。但是心理学家们强调，有一些方法可摆脱困境，一开始可增加对立双方的共同经历和建立相互安全方面的新形式、相互性和责任感。在敌对方关系中加强交互作用特别重要，因为它为持续合作提供了基础。对合作的提倡和投入表明这一方或那一方的用心是认真的：“一般认为，另一方为采取建立信任的措施而产生的任何代价将会加强它对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的承诺，这正是因为付出代价是指望今后会有收益。”¹³²

126. 军事设施趋于保密是一普遍特点，其理由是有必要向敌对方封锁战略情报。保密是国际冲突各方堆积起的永久敌人形象中的一块积木。事实上，保密和形象相互加强，形成一个很难打破的观念环节。保密还涉及到将权力集中在军事领域。有关军事安全的行动往往被划出民主管制和公开辩论范畴之外。换句话说，在军事安全需要和政治民主需要之间出现了紧张关系。个别社会试图以不同方式来解决这一紧张关系。传播媒介在这些努力中往往起到中心作用，因为它既能证明军备开支和有关武器的决定合理，又能转达对这两项提出批评的信息和舆论。从这方面来说，传播媒介在军备竞赛中发挥着牢固的双重性作用。¹³³

127. 国家安全问题并非是脱离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的孤立的问题。这就说明值得为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得失进行熟悉情况的公开辩论，并在辩论中将保密的需要降到适当程度。这样的辩论和随后在国家间发展起来的批评性舆论也会消除国家间

无知和偏见的城墙。它还会减少保密性和有成见的敌人形象，并加强信任。在过度保密和歪曲消息的气氛下不能产生真正的信任，在安全的关键领域需要有更多的公开和交流。除了公开以外，建立信任以采取不使用武力和借着裁军缩减军事能力的具体措施为先决条件。因此建立信任是一概念性的政治进程，为可靠起见，与此同时还应采取限制军事力量的具体措施。因此国家间信任产生于国内和国际条件和政策。

128. 军事设施和文职社会往往被视为是社会两个单独的分支系统，但实际上却是交织在一起的。有时候军事和文职分支系统的相互渗透确实表现得十分强烈；极端的例子有军事政变和文人政府推翻军队。但是一般来说，它们的相互渗透不太激烈，也并非显而易见。其实在多数和平时期的社会中还有另一个社会，一个在危机中十分活跃的“影子社会”。通常在建立这样一个社会时，军事和民政当局并不敌对，而是互相合作。这种合作与较明显的军事化迹象——包括新型武器系统和军事游行——相比起来，对舆论的影响要小一点。然而这种无形的联系必然会影响到有关社会的社会和文化方面。

129.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军备竞赛对青年及其看法所产生的影响。对老一辈的人来说，他们亲身经历过大战，因此将发展和部署武器看成是“正常状况”。尽管这种经历本身也会对军备竞赛和战争产生持续的反抗。在多数情况下，这一反抗心理是战争的恐惧和毁灭性造成的。对年青一点的人来说，现代武器——特别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进一步显示出他们不得不设法寄身求生的社会的疯狂的和无理性。青年人在游行示威反对新武器的同时，还反对他们在全球和国家社会中看到的其他威胁和不公正。军备竞赛对他们来说是更复杂的畸形发展综合症的一部分，对此必须努力消除或尽可能遗忘。这样，军备竞赛在舆论中，特别是青年人形成的舆论中产生了反响，超出国内和国际安全的直接后果。这就是为什么不能用一个狭窄的军事或经济术语来衡量军备竞赛的影响，而应该探索它对一个社会的整个社会和文化关系所产生的影响。

H · 改变用途方面的影响

130· 如果不审查在分配政府预算时减少军事努力的影响问题，就不能认为对军事开支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分析是完整的。军备限制和裁军——即从数量上削减和从质量上限制各国的军事能力——可以改变军备竞赛的经济后果，这一点已得到普遍证明。在工业上和以某些其他形式改变用途，这就是在国家和地方范围内执行这类变革的方法。因此，改变用途不仅是任何限制军备和裁军的努力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对将资源建设性地重新分配用于民用活动的努力来说也是如此。

131· 改变用途有着政治、经济和技术意义。从政治上来说，改变用途是一种战略，其目的是为被军备竞赛消耗掉的资源拟订其他用途，并确保这些用途的应用工作得到适当管理。因此，要改变用途，就必须在国家和地方一级采取措施。由于裁军会影响各国和国际安全，不能仅仅为了裁军本身的效益而提倡裁军。不能将改变用途问题同整个国际关系制度分别对待，这一结论似乎已得到普遍接受。这是因为能否执行要取决于各国的政治意愿以及是否愿意采取被认为能加强国际安全的裁减军备和裁军的具体措施。因此，将一个军事经济转变为民用经济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¹³¹ 虽然人们已认识到了改变用途的政治意义，然而，不应因此就产生忽略其经济和技术问题的现象，本节审查的就是这些问题。如果能使关于如何改变用途的具体计划——尤其这方面的实际经验——有一次政治机会，这将增加改变用途的可信性，并促使决策者和公众都相信军备裁减实际上是可行的。

132· 任何国家都可以采取减轻军事负担并从而开始改变用途程序的单方面措施。从实际的全球政治角度来说，裁军必须由大国在关于裁减军备和消除特别军事能力的可核查的相互协定基础之上开始。这方面的进展不仅将导致这些大国的军事经济转变成为民用经济，而且还将使中小国家能够开始削减和改变其自身的军事能力。因此，一项为瑞典制订的改变用途计划的先决条件就是国际谈判必须在25年的期限内逐渐产生结果。在这种情况下，瑞典还会既能减少用于防卫的资源，又不危及

其安全。¹³⁵ 当然，关于改变用途何时能成一项可行的政治选择的任何设想都是临时性的。然而，东西方军备限制对话的目前进展表明，在这样一个时间范围内可能需要早期阶段便制订改变用途的策略。在某些情况下，削减军事开支的积极影响只能在中期或长期内才能发挥出来。人们希望迈入一个多一些和平、少一些军事化的世界，而为被军备竞赛消耗的自然、技术和人力资源拟订其他用途的各国和地方计划，就是这一希望的一部分。

133. 改变用途规划如欲有效，就必须十分具体，即必须针对各有关工业和公司。这些工业和公司的特性——例如依赖对军方的销售——极大地影响了改变用途程序的性质和可行性。除了国家规划以外，在市场经济中，公司经理人员和工会领袖冒险进行改变用途的规划的能力和意愿，对是否能够圆满实现改变用途有关的重要性。然而，这样做的先决条件，是必须在新技术项目、生产计划和销售战略成熟起来所需要的若干年里坚持不懈。¹³⁶ 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经常指出，在中央计划经济里，改变用途比较容易实现，因为推行改变用途计划的工具已经具备。然而，他们并不否认市场经济也能将其军事经济改为民用。改变用途须逐步进行，据说这种性质有利于它的执行，因为这使人们有了规划和学习的时间。¹³⁷

134. 美国和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有在重新分配资源的过程中将各个军事基地和工厂转为民用的一些经验。¹³⁸ 虽然人们认为将军事基地改变用途是政府的责任，但人们通常是从多少具有自发性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更新程序——这涉及新产品、发展新生产程序和推广其他程序——的角度来看待市场经济中的军工业改变用途问题。因此，改变用途的责任主要由工业而不是由国家或市政当局来承担。然而，同大量减少军备有关的改变用途的情形则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期望有关的军工业和公司能够单独解决改变用途问题。飞机公司实行多样化以建立民用生产线的经验表明，这些问题并不是都很容易解决。由于这一原因和其他原因，必须制订一项政府改变用途问题政策，这包括税务减免、重新训练工人和支持投资等措施。¹³⁹ 由于目前用于军事的财政资源可以用于促进民用经济，这类政策是可行的。

135. 就改变用途过程中遇到的调整问题进行宏观经济研究后可以看出，在军事

化程度不太大的小国，这类问题通常都是有限的。一项比较简单的国家对策方案足以补偿就业的任何损失或国民产值的下降。对若干国家进行的研究证实了这种情况。例如，挪威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说，如果不采取对策的情况下，将军事开支削减15%，将使总就业水平下降0.8%，如果实行全面裁军，总就业水平将下降5.6%。在严重依赖军事合约和就业的公司和社区，可能会发生严重的调整问题。但这些问题可通过国内对策来减轻。在瑞典，计划在1990年至2015年逐渐将国防预算削减一半，这样，每年就必须在国防工业和军队里裁减1430个雇员。重新雇用的需要表明，在这25年里，整个瑞典劳动大军中受影响的不到百分之一。这一问题是可以控制的，尽管必须重新进行训练，并必须为最专门化的军事产品生产设施采取特殊措施。¹³⁰ 就其他国家进行的计算似乎表示只要国际形势允许，改变用途一般是可行的。

136. 劳动大军的改变用途在传统上一直是改变用途规划中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这一问题既有经济上的针对性，又有政治上的敏感性。然而，改变用途的技术问题最近增加了重要性。这是因为研究、发展和技术在公司和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中越来越具关键作用。大型军事技术项目被视为取得竞争实力和威信的工具。因此，改变用途不仅仅限于教授研究和人员新知识和技能，而且还必须在新领域实际应用这些技能。¹³¹ 换句话说，改变用途程序同各国和各公司的技术政策——这些政策必须发展其他的具有竞争性的民用项目——的联系日趋密切。

137. 由于军事生产具有技术密集性，因此在使工程师和其他熟练技工转到民用工业工作时，可能会发生特殊问题。然而，必须注意的是，在新的技术领域——例如电子、光学和空间工业——改变熟练的劳动大军的方向该不是一个不可克服的问题。资源以前被用于军事目的，而现在则有了其他用途，这方面可能促成的效益远远超过了改变用途过程中暂时的困难。这类其他用途将包括以下方面的大规模项目：发展新的能源、改善运输和建设老化中城市及同教育、保健和福利有直接联系的项目。还可以通过跨国公司执行这类项目，从而促进双方的利益和国际了解。

138. 根据上述分析，很显然裁军对经济和社会有积极的影响，因为裁军可以腾出更多的资源改为民用。军事开支无论在短期内能作出何种积极的经济贡献，效益都少于大多数类型的非军事政府开支。许多国际讨论会——包括1987年裁军和发展间关系国际会议——都已认识到这一点：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显然还面对着发达不足问题，这样，军备竞赛消耗的资源份额就太大，并妨碍国际商业、合作和信托的建立。然而，这一关系的影响是复杂的，它因国家因时间而异，并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满足最起码的安全需要、投资数额、增长率和满足基本需求等指示性因素。如果从军事能力的和失去的机会有代价的角度审查军事费用，人们就会产生下一看法：如果利用国民生产总值的标准并注重微小的预算机会代价，就会为估价军事开支的政治军事后果和机会代价提供最佳的全面衡量工具。

139. 如果记住这一点，则对1978年和1984年的各国政府预算分配的审查后可以看出军费的分配在工业用有所增加，而在发展中国家则有所减少。对其他拨款的审查表明，可能会产生有利于社会效益的转换，至少在工业国家是如此。但是，这也表明，发展中国家削减军费后并不绝对会增加社会福利的拨款，至少在经济衰退时期不会如此，因为这些国家此时有众多的迫切问题。有迹象表明，军事开支对满足基本需求产生了不良影响，总的经济衰退必然会导致削减军事和民用开支，其他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140. 在大多数其他国家——无论是中央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存在着军事开支和社会经济发展相互转换的潜力。至于军事开支的机会代价，这种开支起初刺激了需求和就业，但后来排挤了生产性投资，从而对增长产生了不良影响。投资具有关键的重要性，可以确定在浩大的军事开支和较少的投资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前者减少了后者可用的资本。此外，军事生产消耗了本来可用于支助出口的经济增长的资源。在发展中国家，经验表明这些影响较大，在较不发达和最不发达国家则更大。

141. 军事就业不是解决失业的有效方法，这一点也已可以看出。 尽管在这一领域应考虑到各种复杂因素，但有些一般性发现：军事承包商正在扩大对分包商的控制；同军事有关的就业正在跨国公司下扩展；军事开支趋向于通过减少在更多的劳力密集部门的政府开支，促成失业现象；一般说来，按照投资额单位计算，军事部门雇用的人数少于民用部门。 有时，军工生产保护了陈旧的“烟囱”工业的就业机会。 军工生产这样做，不但使新工业——新工业本来雇用的人数就较少——而且也使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劳力密集型的民间政府活动或非政府生产及服务业流失了员工。

142. 军事开支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是：军工市场寡头垄断和没有竞争性的做法导致物价上涨，而公开市场无法容忍这种上涨。 还有，军方注重性能，因此使价格上升，这与通货膨胀不同。 但是，与军事开支有任何增加的同时，如不相应减少其他政府或私营开支，这一般会造造成迫使物价上涨的压力。 正如已指出的那样，重武器价格昂贵，这对出口军火起了促进作用。

143. 显然，先进的民用技术也可能有军事用途。 然而，许多军用技术就其最终用途来说是专供军用的。 传统的结论是，军事研究和发展的附带作用是有限的。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越来越多的技术具有双重用途，在这一领域的分析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归根结底，问题是技术发展究竟是取决于防卫需求，还是取决于发展需求。 大国的大型研究项目帮助了参加项目的各公司，但是，这些项目的性能和保密标准在民用市场则是次要的。 总的来说，只要国家安全得到保证，如果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注重资助民用研究和发展，就可以更好地满足人类的需求。

144. 军事方案——特别是近年来的军事方案——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不平衡的经费流动和债务，尽管具体情况大不相同。 国内军火生产的基础设施需求加强了这一趋势。 但是，任何形式的巨额军费开支都减少了注重出口的投资所能获得的资源，从而破坏了出口情况。 作为军火销售补偿的出口贷款使这一情况进一步恶化，对在困难和衰退的市场中依赖商品出口的国家尤其是如此。 因此出现了易货

安排，从而促成了贸易伙伴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技术上的共同点。这种种原因造成资本逃逸，再加上内部经济不平衡，由此而产生的总的债务问题在拉丁美洲国家特别严重，使这些国家的政府不得不迅速削减政府开支。中东是主要的军火进口地区，军火继续流入中东，波斯湾战争一部分是靠外部资助维持的。然而，由于石油收入下降，虽然有这种现象，但经济上的损失是不可逃避的。

145. 技术和军事工业造成了新的社会、政治和心理条件，这些条件导致为本国安全利益而破坏全球安全的不合理和不明智的安全政策，在核政策方面特别是如此。这种矛盾导致对各种政策的抗议，即使是在各国内部也是如此。因此，出现了对合作关系、对等和信任的需求，例如，在主张实行核威慑者和主张承诺共同安全者之间就是如此。资讯的开放，可以帮助在主张这类不同学说者之间建立信任 and 了解。在消除政府同公众之间及各不同公众阶层——例如老一代和青年一代——之间的异议和冲突方面，各国和国际大众传播媒介及军民交往都有待发挥作用。

146. 通过把军用商品和服务转为民用的程序，可以更富有建设性和更富效益地分配资源。在一项裁军的程序中，如果各国政府和工业能在地方和国家范围及全球范围进行合作，于相当长的时间内经过周密计划完成这项工作，则其本身不会造成不应有的失业现象或其他劳工困难。

第四章

军备竞赛的国际后果

147. 本研究报告以上各章讨论的问题是，在一个比五年前更为复杂的社会中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及军事开支所造成的影响。本章的重点是，在这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上，军备竞赛对国际关系及目前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因国家受到军事及战略考虑的左右，因此军备竞赛对国家间的关系必有影响。它还影响到国际经济局面，而此种局面的特征是金融、货币及贸易均不稳定。另外，军备竞赛还使全球性的问题恶化，对这些问题鲜有国家能避其影响。

148. 国际安全体系的保障是集体安全体系及《联合国宪章》中制定的宗旨和原则。唯有有效地实施上述安全体系，迅速而大幅度地削减武装力量，并达成国际协议去最终在有效国际监督下实行全面彻底裁军，人们才能实现真正而持久的和平。

149. 在报告所涉期间，由于世界发展迅速，特别是核军事领域中突飞猛进，再加之必须维持和平，于是便出现了两种新的国际安全的概念：

共同安全的概念依赖的信念是，只有所有国家（包括被视为对手的国家）展开合作与协调，才能取得真正的和平。在经济、社会和生态方面的脆弱处境所提出的难题要求人们对国家及国际安全的问题采取新的而全面的做法。在安全的概念上提出新内容的上述见解出自裁军和安全问题独立委员会（帕尔梅委员会）及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布伦德兰委员会）。这二者均主张，共同安全的概念要求将国家和国际安全的范围扩大到非军事领域。

国际和平与安全综合体系的概念要求国际关系的所有参与者共同努力，致力于对国际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及与此有关的下述各个方面：裁军、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和冲突，经济发展与合作，保护环境及促进和维护人权。¹⁴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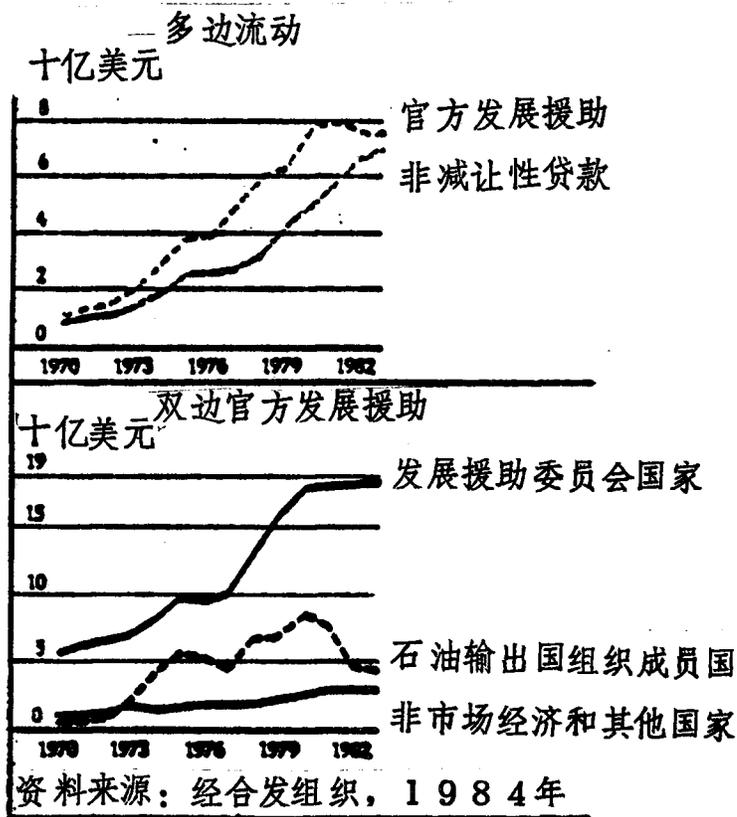
150. 主要大国的军事开支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功能。本系列以前的各份报告均突出了军备竞赛是如何助长了经济歧视并阻碍了商品、技术、资本流动和劳务进行

交往的。在用于军工的关键技术和战略原料方面，情况尤为如此。并非鲜见的是，对此类技术或原料上的贸易加以禁止，原因是担心对手获得此类技术或原料后在军事上得益。¹⁴³ 因此一方面进行军事竞赛，而在另一方面则从政治上努力控制具有潜在军事用途的经济交易。换言之，军备竞赛易于同时造成政治与经济两方面的冲突，从而使国际关系紧张化并使世界经济的职能受阻。

151. 除其他方面外，军事开支影响到了资本投资的程度及技术革新的性质。军事开支还影响到国际贸易及资本流动的平衡，影响到全球的通货膨胀及各国的债务情况。它影响到参与军备竞赛的国家对外的资源流动，然而它对国际收支的实际影响却难以确定。换言之，军事开支能使世界经济出现不平衡、波动及薄弱环节，并因此危及世界经济的稳定。可以设定的是，几乎所有国家如不投入高额的军事开支都会改善其对外的资源流动。¹⁴⁴ 因此，如若将军事工业转用于民用生产，这在国内和国际上均会有所影响。

152. 在世界经济中，将资金用于军事目的或将其转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努力这二者之间是有可能作出交换的。虽然在现阶段由裁军省出来的资金不一定都能直接转用于发展目的，而在国家一级此两种开支是有联系的。这是因为，裁军会扩大决策者可赖于为发展项目增加资金的备用国家资源。此外，裁军还能改进政治气氛，从而巩固国际合作的基础。为什么必须认真考虑裁军可带来的好处可由下述事实得出更清楚的答案，即如以下图二所示，从1970年代晚期以来，对发展中国家的双边及多边资本流动趋于停滞状态。

图二. 按来源分的官方净援助额, 1970 - 1983年



资料来源: 《1985年世界发展情况报告》(华盛顿特区, 世界银行, 1985年), 第99页。

153. 确实, 官方发展援助的主要制约因素是捐助国同受援国之间政治和军事纽带。某些捐助国提供发展援助的主要动机即是军事和战略上的考虑。因此, 这些国家并不优先考虑受援国迫切的发展需求。应予指出的是, 许多发展中国家本来就难以从国际上获得资金, 而且它们常常无法从跨国公司那里吸引到直接投资。私人投资者不愿将其资本投入政治和军事形式紧张的地区。此外, 一般来说, 私人资本或国有公司的投资主要是进入在政治上得到捐助国支持的国家。因此, 军事和战略上的考虑使私人资本的走向和技术转移发生变态: 这可能使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

154. 由裁军省出来的资源可紧急用于下述方面，消除饥饿与贫困，消除文盲，保护儿童免受暴力及欠发达造成的双重危险。现在全世界都意识到，军备竞赛在同发展争夺有限的资源。这不仅影响到各国去满足其紧迫的社会需求，它还影响到通过国际行动来满足这些需求的可行方式。最近一份研究报告就此提出了令人吃惊的资料：世界军事开支等于 44 个最不发达国家的 26 亿人民的总收入。¹⁴⁵ 如果将国际上用于教育、保健、住房、营养及有关的开支同军事开支相比，那就更说明问题。例如，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估计，在全世界为儿童免疫六种疾病的费用只需 3 亿美元，这相当于全世界在三小时内用于军事目的的开支。在四小时内，全世界的军事开支就相当于目前儿童基金会两年的预算额——5 亿美元。¹⁴⁶ 由于国际暴力和欠发达现象普遍，难民问题日趋严重。据估计，1986 年难民人数近 1,200 万。¹⁴⁷ 军备竞赛所助长的武装冲突使人们广受其害并流离失所，而其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儿童。

155. 本报告进行的研究充分表明，军事开支助长了国家生产结构的分裂和经济发展长期目标的瓦解。军事开支对生产力的提高有着尤为不利的影响，从而削弱了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竞争力。当然，国家经济效率降低的原因不完全是军事生产。可是一旦出现此种下降，军事生产是一个明显的原因。¹⁴⁷ 虽然军事开支对经济的全面状况的影响因国家而不同，然而在所有国家最终的消极后果似乎颇有相似之处。¹⁴⁸ 因此，高额的军事开支影响到国与国之间在世界经济中经济实力的分配。一般说来，那些卷入军备竞赛最深的国家也容易在经济上受到最为不利的影响。这甚至可能意味着目前庞大的军事开支会因其对经济造成的消极影响而削弱国家对未来的军事保障添砖加瓦的能力。

156. 这一分析还说明了庞大的军事开支因其在经济上造成的影响而在政治上带来的后果。此种开支瓦解了国家根本的经济实力及全部潜在的活力，从而易于导致国家在国际力量中地位的下降。换言之，军事开支同时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从短期的角度来说，它可能增强国家的军事实力；但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它却会起

到消极的作用，因为经济中的民用部门的投资及革新会逐渐趋于枯竭。事实上，历史表明，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将国家资源过多地用于军事会带来消极的结果。因此，如果奉行国家扩张的政策，此种政策连同随之而来的对军事及行政机构的需求会使经济陷于停滞状态。反过来，这又会使国家在国际经济实力的对比上地位下降，这也就相应瓦解了其政治和军事实力。¹⁴⁹

157. 庞大的军事开支不仅奠定了国家之间的权利分配，而且还同国家间的政治关系息息相关。军备竞赛意味着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因此它也就侵害了《联合国宪章》的一项基本原则。军备竞赛还带来紧张和猜疑。它制造出各种形式的永久敌国形象并带来难以消除的安全难题。所以军备竞赛助长恐慌和不安全的心理，而这种心理同军备竞赛可能产生的加强安全的作用是相抵触的。前一份报告非常生动地论述了军备增长是如何导致国际政治气氛的恶化的。最后，军备竞赛的升级会导致公开的军事敌对，并有可能诱发使用核武器。¹⁵⁰

158. 各国及军事联盟的军事活动目的在于提供对付外来威胁的起码安全。在另一方面，此种活动不一定会带来预期的结果，原因是此类活动会诱使潜在的敌手在质和量两方面采取军事性的对应措施。这些对应措施可能包括获取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于是便会使各种安全问题更为严重。如果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史中吸取教训的话，这就是：单方面的军事活动及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均无法以长期而可行的方式确保和平。可是，现在政治事实是，有些国家的安全取决于别国的决定和行动，尤其是头号军事强国的决定与行动。所以，如现实地分析问题，那么唯有包括潜在的军事敌手在内真正的国际与区域合作方能保障安全。

159. 由于国际安全是极端重要的，所以一方面需要更有效地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另一方面需要对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进行可核实的限制和削减，同时执行裁军措施。联合国和各区域组织一起，在帮助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中具有特别作用。这一作用可以并且应该通过争取更加和平与公平的国际体系来增强，这将需

要加强联合国维持和平与斡旋的能力，同时，也需要在由于军事冲突而面临危机的各个地区进行经济和社会重建。加强现行的区域安全安排并建立新的安排也将加强安全，同时无疑将促进经济合作和发展。长期来看，如果不有效地解决国际争端，执行可核实的限制军备协议，减缓区域紧张局势，从而达到政治和军事的稳定，这两件事都是无法设想的。

160. 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欧安会）是不仅包括了政治和军事，而且也包括经济、环境和人道主义问题的区域安全工作的一例。在个别区域的特定环境内也正在逐渐地产生类似的倡议，以便提出安全战略纲领，并推动区域安全体系。¹³¹ 没有主要军事大国的出力，区域安全就很难得到加强。一般说来，大国的贡献是解决区域安全问题的必要但并非唯一的条件。正因为如此，大国间的合作及大国对限制和削减军备的协议不仅对其相互关系很重要，而且对普遍的国际安全也很重要。地方、区域和国际各级的安全常常是相互关联的。

161. 国防力量一直是而且依然是保护一国不受外来威胁的主要因素。但是，如果每一个国家都不企图以损害其他国家的方式来取得这种安全，那对各国都是最有利的。超过一定范围的军事集结既不增强安全，也不产生经济利益，事实上述可能产生反作用。例如说，军事力量在保障一国不受经济压力方面是比较无能为力的。通过全球性或区域性机构，并通过限制军备的协议来解决争端是对付对安全的直接军事威胁的最有效方法。这些手段如果成功，也可以产生具体的经济利益，因为这样作减少了国防开支的费用；而且最终也减少了战争的费用。当然，用国际或国际手段来核实限制军备协议可能是很花钱的。但是，如果军备竞赛继续不断，将对全人类造成严重经济负担与此相比，上述费用就不大了。

162. 国内经济越来越容易受到外来压力的冲击。各国通常力求平衡的经济发展，避免对世界市场产生太极端的依赖，但是这一目的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实现。由于各国经济迅速国际化，相互的依赖性也增强了，各国经济的弱点可以通过开展国家与国家间稳定和公正的合作形式来处理。可以这样说，如果世界各国的经济

处于内部和外部平衡，而国际合作也不引起极端的依赖和虚弱的情况，那么国际安全就可以得到最好的保障。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世界发展，则各国就有平等享受利益的权利，这也会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

163. 由于世界上经济活动相互依赖日益加强，而且生物圈很脆弱，使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复杂。同时，这种情况也要求我们紧急有效地处理这些挑战。现代社会的这一事实不仅需要以创新的办法来解决经济问题和生态问题本身，而且也需要以新的方式来解释、衡量国家安全问题。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工业化国家，安全都不能脱离国内、国外的经济和社会现实。也就是说，不管在哪一类国家，安全在经济和政治——军事方面的问题都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裁军和发展方面的知名人士小组建议“应当同样地强调裁军的积极结果和安全的要求。”¹⁵² 发展和安全不是可以取此舍彼的，而通过扩大现有的政治视野，这两者就可以相辅相成。¹⁵³

164. 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国际会议《最后文件》透彻地揭示了裁军、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复杂关系，文件说：

“对所有国家而言，安全是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它也是裁军和发展的基础。安全的组成部分不仅有军事，也有政治、经济、社会、人道和人权及生态各个方面。加强安全，一方面能开创有利于裁军的条件，另一方面又能提供顺利推动发展所需的环境和信任。发展进程可以克服安全所受到的非军事性威胁并促成更稳定和持久的国际体制，因而能够增强安全，从而促进裁减军备和裁军。裁军会直接和间接地增进安全。一个使军备水平逐步降低而安全不受减损的裁军进程，可让更多资源用于解决安全受到的非军事性挑战，从而导致加强全面安全。”¹⁵⁴

*
* *

165. 国际安全的基础是《联合国宪章》制订的集体安全体系。在最近的讨论中，提出了共同安全和全面安全的概念，来适应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而安全必须在这一环境中得到保障。

166. 军备竞赛，特别是主要军事大国的军事开支具有全球性经济影响，特别是对某些关键技术和材料的贸易具有影响。军事开支也影响到全球的通货膨胀和债务，造成或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尽管将裁军省下的资源直接转用到发展项目也许不总是行得通的，但裁军的进程可以增加资源的储备，而决策者可利用这些资源作出各种决定。但是，政治因素常影响到发展援助和私人资本向接受国的流入。

167. 大笔军费开支对提高生产力也有害处，对于开支较大国家的经济将来会有损害。军费开支引起投资和革新减少，从而造成经济停滞，经济力量相对下降，军事力量也相应下降。军费开支还往往对国际收支状况产生不良影响。

168. 面对用于军费开支与地位不利者福利两者之间的差别悬殊，全世界对军备竞赛和发展之间应作何选择已有了进一步认识。难民问题也可以说明军备竞赛间接导致社会、政治问题，并排除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机会。

169. 尽管现在仍然需要国防，但如果按共同的协议对国防加以限制，则对所有国家都有利。超过一定限度，军事力量的效用便于原本的意图相反了，而且军事力量也不能有效地保护本国不受经济压力。加强含有许多潜在利益的区域文件和可核实的军备限制协议与继续军备竞赛相比代价是很小的。

170. 各国经济正处于加速国际化和日益相互依赖的变化过程。这种相互依赖性加之生物圈的脆弱性，需要我们对安全问题有更广泛的考虑。安全的经济与政治，军事问题在所有各国都是相互联系的，而且必须考虑到社会和生态方面脆弱性的现实。

第五章

结论和建议

171. 除了各章所载的结论以外，可从上述分析得出一些一般性意见。1980年代军备竞赛继续进行，特别在质量方面未曾稍停，事实上其规模在不断扩大，速度日益加快。这种发展在核武器方面最为明显，因而必须予以裁减并最终予以消灭。总的来说，军备竞赛约占全世界产出的6%，在一些重要地区这个比数更高。当前的技术发展改变了军事环境，并产生了各式各样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后果。由于各国或各国家集团之间军备竞赛的负担彼此差别很大，因此所产生的后果也不相同，不可作出简单的结论。另一方面，军备竞赛作为一个全球现象，对每个国家的安全和发展都有影响。军备竞赛现象越来越彼此相关，超越了国家界线和功能性分界，例如在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影响。军备竞赛在质和量方面不断扩大，对国际关系及其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

172. 本研究报告表明，军事支出对社会和经济有深远影响。军费开支最大的国家，其经济所受影响也最为明显，特别是以现代科学和技术为主的那些经济领域，这是当前军备竞赛的一个主要因素。军事支出产生的长期不良后果使得任何正面的短期效果皆微不足道。因此，军事支出助长了经济停滞、结构失调，影响了各主要经费使用者的经济和政治前途和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由于争相控制现代技术而发生变化。至于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迫切需要刺激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又要增加军费，两者之间必须作出选择。军备竞赛产生的社会和文化后果在参与竞赛的每一个国家都很明显，它对资源的分配及其社会的政治气氛都产生影响。处境不利的人最能深刻感受军备竞赛产生的社会影响，由于资源不足，他们的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因为有些资源被用在军备竞赛方面。在将国家资源用于军事用途和解决全世界各种社会问题的能力之间有一种真正的交换关系。专家小组强调在这方面作出政策性决定时必须考虑这个交换关系。

173. 由于常规武器和武装部队占用了全世界军事支出的大部分，因此更加应该

加以限制和裁减。撇开各项社会优先事项不谈，从其他的因素来看，也有必要裁减常规武器。常规武器军备竞赛已从世界一级扩大到区域和地方一级，它制造紧张情势和冲突，平民和士兵同遭杀害，并对人权造成威胁。

174. 为停止军备竞赛所作的努力，特别是在核领域所作的努力，表明了追求更安全合理世界的普遍愿望。1978年举行的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即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强调了建立一个有效限制军事力量的世界的愿望：

“停止军备竞赛和达成真正裁军是最重要迫切的工作。应付这个历史性的挑战，符合世界所有国家和人民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并可保证他们的真正安全与和平前途。”¹³³

为实现这些目标，各国及其政治领袖应当考虑采取有效行动，限制军备竞赛，签订双边和多边协定并采取各项国家自制措施，开始实际裁军。长期展望还应当包括通过谈判，坚决采取行动，停止采用使军备竞赛得以持续进行的技术创造发明。

175. 军备竞赛的加紧进行在一般公众和决策人士当中产生了新的政治观念。他们认识到核战争达不到任何目的；核子大战没有胜方。因此，防止核战争在确保人类生存的努力中被列为高度优先事项。为促使这个目标的实现，各国应当完全使用和平手段来解决争端，并且在国际有效管制下采取步骤，以实现全面彻底裁军。公众日益觉察到核武器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用处日益减少，因而有助于在这个方向采取初步步骤。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签订的《消灭中程和短程导弹条约》（《中导条约》）配合有效的核查程序为大量裁减战略核武器开辟了一条新路。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发展，特别是如果以消灭和裁减其他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作为支助，则这个发展就有可能加强所有国家的安全。

176. 正如1987年裁军与发展间关系国际会议最后文件所强调指出的，裁军、发展和安全是一个综合现象。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经常很复杂，很难用简单的方法来加以说明。但是很明显，必须用广泛的概念来界定安全。一个关于安全的综合概

念包括许多发展问题，因为有关安全的构成部分包括对人类的威胁到生存、尊严和幸福。在这个意义上，平等发展对国际安全和国际安全都有助益。裁军必须对安全和发展都有好处。除了可以作出这种直接贡献外，裁军还有助于将人力和国家资源重新分配，为各项进一步发展努力作好准备。这些发展可以加强安全的基础。

177. 国际经济关系的扭曲，包括商品价格和债务问题，使得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更加迫切需要合作。工业发达国家承担更大的责任，在官方发展援助的范围内促进发展合作。随着在军备限制和解决冲突方面取得进展，国际社会的注意力应当更有效地转移到发展不足、不安全和生态恶化等问题上。这种对优先次序重新评价的工作应当以重建全球和区域一级的国际多边机构与合作相配合。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高军事开支，同提供更多发展援助的要求，二者实为彼此争取优先的事项。

178. 专家小组强调指出，要推动国际采取裁军和发展两方面的行动就必须有一个更有效的联合国。在全面加强本组织的能力方面进行合作应当可以为改善和加强一般多边国际机构的职能铺平道路。朝这个方向所作努力，应着重改善这些机构提供信息的效能，使所有国家得以研究军备竞赛、限制军备和裁军，以及详细分析为这些目的而收集的资料。因此联合国组织大家庭应当在协调各国的意见和利益、鼓励各国采纳和执行积极的、面向行动的政策方面发挥更好的作用。联合国除了在国际军备限制协定的审议和谈判方面发挥作用以外，还可以在这些协定的核查和遵守方面作出贡献。在联合国的诱导下及早解决争端，有助于在国际关系上排除使用武力，因而可以避免使用武装冲突和以破坏为目的所需的资源，很明显这些冲突和破坏不利于发展工作。这种解决争端的做法加上促进各国间的合作可以打消主动建立和维持军备的动机。因此，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进行合作，努力增进了解，解决国家间的争端，停止冲突所产生的总效果也可以减少军事对稀有资源的消耗，至少可以把这些资源的一部分重新调配，用于社会 and 经济发展。即使有了敌对行动，发展问题还是重要的。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各区域组织，例如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以及一些非政府组织可以为经济的重建和复兴进程作出贡献。此外，联合国

维持和平部队除了隔离武装冲突各方以外，有时候还向当地人民提供过并且可以不断提供保健服务，协助他们重建家园。

179. 联合国系统在好几个领域具有广泛的知识 and 经验。在研究裁军与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时可以对这种专门知识加以更有效的利用。更具体地说，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可以在各自专长的领域，对裁军如何促进发展的问题进行实际研究。

180. 现在日益需要加强国际合作以保护和确保全球共有领域（从海洋、两极地区至外层空间）的未来。同时，全球共有领域的安全、经济发展和生态平衡三方面的需要，必须结合考虑也日益明显。因此，各国必须合作，努力促进国际安全、经济发展和生态平衡。

181. 军备竞赛仍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产生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影响。虽然限制核武器、化学武器、常规武器和军队的种种努力，目的是加强国际和国家的安全，但不应忽视这些努力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影响。事实是，对军备裁减造成的社会和经济影响预先进行系统的评价和制定各项将军用转为民用的计划，将会促进裁军的进程。的确，学术界和决策阶层应扩大研究经已协议的军备裁减对社会、经济和技术所造成的后果。

182. 在执行各项裁减武器和拆除其生产设备的政治决定之中，用途的转移问题是一个关键因素。为了转移成功，这方面的各项努力必须实事求是地处理有关的经济和技术问题来寻求解决办法。这样就需要受转移过程影响的当地人民参与进行。这一过程有着宏观经济的特性，只能够由国家一级来处理。为了更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一些国家已经开始进行了国别研究，研究转移用途的可行性和范围。这些研究可以为政治和经济决策提供有用的资料，应该予以鼓励。联合国可以任命一组专家来深入探讨这一问题，让资源从军用转为民用方面的研究获得国际性的支助。

183. 一般说来，大众对军备竞赛及其后果的观念对于当时形势的发展和消除战

争危险的种种努力有着关键性的影响。在这方面，非政府组织是重要的媒介，可以明确表达人民的意见并将之传送给决策过程。一部分青年积极参与反战运动。另一部分青年仍未认清核战对人类的极端危险性。因此，联合国在其世界裁军运动的范围内必须考虑设立一个特别针对青年人的宣传方案，目的是让他们更深入地了解军备竞赛的内容和后果以及核战争的潜在后果。

184. 军事开支，特别是大国的军事开支，对于世界经济的运作有明显的影 响，特别是国际贸易和资金流动、技术转让和国际金融制度。鉴于军备竞赛对国际经济有着多方面的影响，因此裁军和发展领域知名人士小组在联合国的主持下所作的建议是最恰当的。他们呼吁“定期分析世界性的军事开支对全球经济前背所造成的影响，同时考虑到其对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各种经济体制所产生供求方面的限制”¹⁹⁶。同样地，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国际会议在《最后文件》中作出结论，认为“联合国应继续定期分析全球军事开支对世界经济和国际经济体系的影响”。¹⁹⁷

185. 预算赤字是军事开支对国际经济的影响的一个恰当的例子，在许多国家，预算赤字是由于大量军事开支造成的。这些赤字每每使国际经济关系反复波动，影响利率，操纵国际资金流动。由于军事开支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增长有多方面的影响，增加这方面的研究是十分有价值的。从增长率、资本投资和就业方面来说，有充分证据显示军事开支影响到各国经济的发展。不过，有关军事拨款和国际经济过程的相互关系方面的知识，其可靠性则相差很远。因此，专家小组建议联合国支助进行关于军事开支对国际贸易和金融的影响的研究。同时，还需要就军备裁减对有关国家的经济的影响和它们对其他国家的经济的间接影响进行更多的研究。

186. 为了向大众解说军备竞赛在社会、经济方面所造成的负担有一个必要条件，即军事开支的资料要充分公开。目前不可能就全球军事开支或甚至是军备竞赛中的一些主要参与国的军事开支提供可靠的数字。因此，专家小组极力赞成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国际会议的有关声明：

“关于全球和各国军事开支的完备综合数据库，将大大地有助于研究和分析军事开支对世界经济和国际经济体系的影响。为此目的，尽可能多的会员国应按照对军事预算各具体构成部分所商定而可供比较的定义，向联合国提供其军事预算的客观资料。关于这一点，目前在联合国进行的有系统地审查关于界定、汇报和比较军事预算数据等工作，应予加强。”¹⁵⁸

187. 以前的各项报告和许多大会决议都强调必须继续加紧进行联合国有关军事预算的活动，包括收集军事开支数据和加强这些数据的可靠性和可比较性。在达成适当的国际协定以便裁减军事开支之前，必须鼓励各国采取政策，自我抑制军事开支。关于这方面，采用1980年开始使用的国际军事预算标准汇报制度，确保军事开支可以有客观的比较性是十分重要的。而且，最好能够有尽量多的国家使用这一制度，同时，希望这个汇报制度能够利用各国的会计制度。可靠的军事开支数字不但是分析实际军事负担的必要因素，也是谈判和缔结关于裁减军事开支的可核查的协定中的重要因素。

188. 军备竞赛仍然引起世界的不利，成为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规定和妨碍国际安全和国际合作的因素，国际合作是本报告强调所有有关领域的迫切需要。在这个意义上，一秉诚意实现《宪章》的各项原则，对于裁军进程和进一步腾出资源用于发展需要这两方面都是必需的，并且起着辅助作用。所有这些共同的努力，对于加强和巩固集体安全是必不可少的，其中集体安全的原则是《宪章》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所规定的基本和不可替代的手段。

注

- ¹ A/8469/Rev. 1, 《军备竞赛和军事开支的经济和社会后果》(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 E. 72 IX 16)。
- ² A/32/88/Rev. 1, 《军备竞赛和军事开支的经济和社会后果》(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 E. 78 IX 1)。
- ³ A/37/386, 《军备竞赛和军事开支的经济和社会后果》(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 E. 83 IX 2)。
- ⁴ 参看 1985 年 11 月 21 日日内瓦发表的苏美联合声明全文, 载于 A/40/1070 号文件。
- ⁵ 《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国际会议》(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 E. 87 IX 8), 第 20 段。
- ⁶ 大会 1978 年 6 月 30 日第 S-10/2 号决议。
- ⁷ 首先作为文件印发, 然后以完整标题附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的形式出版如下:
 - 《对核武器的全面研究》(A/35/392)(出售品编号: E. 81. I. 11);
 - 《裁减军事预算》(A/35/479)(出售品编号: E. 81. I. 9);
 - 《裁减军事预算》(A/40/421)(出售品编号: E. 86. IX. 2);
 - 《军备和发展之间的关系》(A/36/356)(出售品编号: E. 82. IX. 1);
 - 《关于建立信任措施的综合研究》(A/36/474)(出售品编号: E. 82 IX 3);
 - 《关于常规裁军的研究》(A/39/348)(出售品编号: E. 85. IX. 1);
 - 《安全的概念》(A/40/553)(出售品编号: E. 86. IX. 1); 以及
 - 《关于威慑的研究》(A/41/432)(出售品编号: E. 87. IX. 2)。
- ⁸ A/37/386, 第 7 段。

- ' 同上，第1段。
- ¹⁰ 参看《苏美首脑会议，1987年12月7日至10日，华盛顿：文件和资料》（新闻一出版社，1987年，莫斯科，第115页至132页）。
- ¹¹ 《国际和平研究所1986年年鉴》（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年，牛津）第210-211页。
- ¹²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87. IX. 8。
- ¹³ A/37/386，第25段。
- ¹⁴ 根据《国际和平研究所1986年年鉴》第233至237页提供的数据计算出来。
- ¹⁵ 这些结论是根据《国际和平研究所1987年年鉴》第173至177页提供的统计数字而得出的。
- ¹⁶ Robert M. Rosh, "Ethnic Cleavage as a Component of Global Military Expenditures" 《和平研究杂志》，第24卷，第1期（1987年），第21至30页。
- ¹⁷ 根据《1986年至1987年军事均衡》的资料，第222页。
- ¹⁸ 这是《真理报》，1987年1月23日，提供的苏联官方数字。
- ¹⁹ 关于进一步的资料，参看《国际和平研究所1987年年鉴》，第24至37页。
- ²⁰ 从《国际和平研究所1986年年鉴》第129页的资料计算出来。
- ²¹ 《真理报》资料，1987年3月13日。
- ²² 《国际和平研究所1986年年鉴》，第129页。根据这一资料来源，估计苏联从1981年至1985年进行了113次试验。
- ²³ A/43/58，附件，第一节。
- ²⁴ 美国，《国务院简报》，第87卷，第2128号（华盛顿），第39页。

- ²⁵ 参看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下列文件：S/16433、S/17127和Add. 1, S/17911和Corr. 1和Add. 1和2和S/18852和Corr. 1和Add. 1.
- ²⁶ 这些和其他有关常规武器的问题在A/39/348,《常规裁军研究》各章有更详细的讨论(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 85 IX 1)。
- ²⁷ 同上。
- ²⁸ A/37/386,第58(d)段。
- ²⁹ 《裁军和发展领域著名人士小组联合宣言》(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86. IX. 5),第3段。
- ³⁰ 《国际和平研究所1986年年鉴》,第299页。
- ³¹ 同上,第299和302页。
- ³² 关于三个主要军事支出国家的军事研究和发展的组织方面的系统比较,参看 Raimo Vayrynen,“军事研究和发展与科学政策”,《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第35卷,第1期(1983年),第61至79页。
- ³³ 参看“调查:高级科技”,《经济学家》,1986年8月23日,第8页。
- ³⁴ 参看Harvey Brooks,“作为科学政策的战略防御计划”,《国际安全》,第11卷,第2期(1986年),第181页。根据1983至1986年期间的数据,在最大的20家战略防御计划承包公司中,头五家公司为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7.25亿)、通用汽车公司(\$5.29亿)、洛克希德公司(\$5.21亿)、汤普森·拉莫·伍尔德里奇公司(\$3.54亿)和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3.5亿),参看《科学文摘》,1986年8月,第53页。
- ³⁵ 参看 Stephanie Neumann“国际分工和第三世界军事工业”,《国际组织》,第38卷,第2期(1984年),第186页。
- ³⁶ 参看 Robert E. Looney和 P.C. Frederiksen,“当前拉丁美洲武器生产商概览”,《国际组织》,第40卷,第3期(1986年)。

- ³⁷ 关于对军火工业种种形式的工业化的系统分析，参看 Helena Tuomi 和 Raimo Vayrynen 《跨国公司，军备和发展》（ Gower ， 1982年，伦敦）。关于冲帐协定，参看 Stephanie Neuman, “国际军火市场的冲帐”，《1985年世界军事开支和武器转移》（1985年，美京华盛顿），（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第35至40页。
- ³⁸ 参看例如 Christian Schmidt, “国防工业备选措施”，载于《促进发展的国家和财政资源》，第二卷，S. Berner 和 L. Taylor 编（麦克米伦出版社，1987年，伦敦）。
- ³⁹ 关于美国的情况，参看 William J. Weida 和 Frank L. Gertcher ，《国防政治经济学》（Boulder 市 Westview 出版社，1987年），第123至124页。关于美国军火工业的透视和深入研究，参看 Jacques S. Gansler 《国防工业》（马萨诸塞州剑桥市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出版社；1981年）。关于法国的情况，参看 Pierre Dussauge, 《法国的武器工业》（经济出版社，1986年，巴黎）。
- ⁴⁰ 参看例如 David Holloway “苏联”一文，载于 Nicole Ball 和 Milton Leitenberg 编辑的《国防工业的结构》（纽约 St. Martin 出版社，1983年），第50至80页。该书还载有各国军火工业的研究，例如美国（Judith Reppy）、法国（Edvard A. Kolodziej）、德意志联邦共和国（Michael Brzoska 和意大利（Sergio A. Rossi）。
- ⁴¹ 参看 Michael Brzoska 和 Thomas Ohlson, “第三世界的武器生产概览”，载于 Michael Brzoska 和 Thomas Ohlson 编辑的《第三世界的武器生产》内（伦敦，Taylor 和 Francis, 1986年），第7至33页。
- ⁴² 同上。
- ⁴³ 参看 Helena Tuomi 和 Raimo Vayrynen, 前引书。关于进口取代经济体系中武器生产的个案研究，参看 Ron Ayres, “武器生产作为进口取代工业化的一

种形式：土耳其的例子”，《世界发展》，第11卷，第9期（1983年），第13-23页。

⁴⁴ 详见 Herbert Wulf 在“发展中国家”一文，载于 Nicole Ball 和 Milton Leitenberg 编辑的《国防工业结构》（纽约 St. Martin's 出版社），1983年，第310至343页。关于个别第三世界国家的军火生产，见 Michael Brzoska 和 Thomas Ohlson，前引书，1986年，又见《新兴国家：第三世界的防卫和安全》，Rodney W. Jones 和 Steven A. Hildreth 主编，（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86年）。

⁴⁵ Herbert Wulf，前引书，第328至336页；和 Michael Brzoska 和 Thomas Ohlson，前引书，第281至285页。

⁴⁶ 参看 Richard F. Grimmett，“主要供应国转让给第三世界的常规武器的趋势，1979至1986年”，（《国会研究服务》：1987年，美京华盛顿。）

⁴⁷ 《国际和平研究所1986年年鉴》，第324页。

⁴⁸ 同上，第325页。

⁴⁹ 同上，第323-327页。全球军火转让的下降由另一资料来源加以证实，该来源估计1985年全球军火转让的价值，按1983年的定值美元计，是\$270亿，1984年则为\$403亿。发展中国家输入军火的数值从\$323亿降至\$203亿；见《世界军事开支和军火转让，1986年》（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1987年，美京华盛顿）。关于这一减少趋势的进一步分析资料，请参看 Christian Schmidt “关于国际军火市场问题”，《Chroniques S.E.D.I.S.》，第36卷，第11期（1987年），第392至399页。

⁵⁰ 《国际和平研究所1986年年鉴》，第325至326页。

⁵¹ 参看 Michael T. Klare，“贸易状况：1980年代全球军火转让的格局”，《国际事务杂志》，第40卷，第1号（1986年），第7至12页。

- ⁵² Michael Brzoska 和 Thomas Ohlson , 前引书, 1986年, 第30至31页。
- ⁵³ 参看例如“宇宙航行空间的防卫”《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1986年4月24日, 第B1至7页; 和“飞机制造商飞行于凄风苦雨之中”, 《商业周刊》, 1987年6月8日, 第62B-D页。
- ⁵⁴ A/37/386, 第63-78段。
- ⁵⁵ 关于这类资源系统纲领, 见 Kenneth Ruddle 和 Dennis A. Rondinelli: 《为人类发展改造自然资源: 发展政策的一项资源系统纲领》(NRTS-22/UNUP-469), (东京, 联合国大学, 1983年)。
- ⁵⁶ 见 Helge Hveem , “矿物作为战略政策和行动中一项因素”, 载于《战略政策和行动中的环境因素》, Arthur H. Westing 主编 (牛津, 牛津出版社, 1986年), 第60-64页。
- ⁵⁷ 详情见 Helge Hveem , 前引书, 第61页; 以及 A/37/386, 第73段。
- ⁵⁸ 同上。 表6所列数据适用。
- ⁵⁹ 关于背景分析, 见 Erik Solem 和 Antony F.G. Scanian, “石油和天然气作为战略政策和行动中的因素: 一种长期观点”, 载于《战略政策和行动中的环境因素》, Arthur H. Westing 主编, (牛津, 牛津出版社, 1986年) 第38-54页。
- ⁶⁰ 参看 A/42/427, 第290-295页。
- ⁶¹ 见 Alexander A. Arbatov , “石油作为战略政策和行动的因素: 今与昔”, 载于《战略政策和行动中的环境因素》。 Arthur H. Westing 主编 (牛津, 牛津出版社, 1986年), 第21-37页。
- ⁶² 详情见 AL Gedicks “新资源战争”, 《原料报告》, 第1卷, 第2号(1982年), 第8-13页。 Mats Hammarström 的一份详细研究报告《以

武力获取资源：对原料的需求以及大国对较不发达国家的军事干预》（乌普萨拉，乌普萨拉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系，1986年）赞成关于矿物因素一般不会挑起战争的结论。Hammarström 调查了美国、英国和法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军事干预。他发现在列强中，只有一次在干预和对矿物的依赖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然而不甚强的相互关系。在其他事例中，这种相互关系微不足道或不存在。

- ⁶³ Fernando Gonzalez-Vigil, “新技术、工业结构改革和变化中的金属消耗模式”。《原料报告》，第3卷，第3期（1985年），第11—31页。
- ⁶⁴ 例如，见Arthur H. Purcell, 《最优利用资源与世界和平》，Occasional Paper 30（马斯卡廷，衣阿华斯坦利基金会，1982年）。
- ⁶⁵ 见“次要金属的主要效益”，《经济学家》，1986年8月23日，第65页。
- ⁶⁶ 见Jacques Aben和Ron Smith, “联合王国和法国的防卫和就业”，载于《和平、防卫与经济分析》，Christian Schmidt和Frank Blackaby 主编，（伦敦，麦克米兰，1987年），第384—398页。
- ⁶⁷ 《军备竞赛和军事开支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A/37/386），第58(e)段。
- ⁶⁸ 提交给国际劳工组织召开的裁军与发展关系国际会议的题为“裁军与就业”的论文，1986年4月，（A/CONF. 130/PC/INF/15），第2段。
- ⁶⁹ 见美国军备管制和裁军署，《1986年世界军事开支和军火转让》，（华盛顿特区，1987年），第59—62页。
- ⁷⁰ William J. Weida和Frank L. Gertcher, 《各国国防的政治经济》，（博尔德，西景出版社，1987年），第147—149页。

- ⁷¹ 见 Michael Brzoska, “西欧军火生产的经济问题”, 载于《军事化和军火生产》, Helena Tuomi和Raimo Vayrynen 主编, (伦敦, 格鲁姆·海尔姆, 1983年), 第67-69页。
- ⁷² David K. Henry 和Richard P. Oliver, 前引书, 第6-9页。
- ⁷³ 见Rebecca Blank和Emma Rothshild, “美国国防支出对就业和产量的影响”, 《国际劳工评论》, 第124卷, 第6期(1985年), 第689-693页。
- ⁷⁴ 同上, 第678-685页。
- ⁷⁵ Marek Thee, 《军事技术、军事战略与军备竞赛》, (伦敦, 格鲁姆·海尔姆, 1986年), 第107-108页。
- ⁷⁶ 关于这类分析, 详见Langdon Winner, 《鲸鱼与反应堆: 在尖端技术时代寻求界限》(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86年)。
- ⁷⁷ Inga Thorsson, “为了实现裁军, 瑞典将军用生产转为民用生产”, 《第1A卷: 背景, 事实和分析》(斯德哥尔摩, 利伯, 1984年), 第133-134页。
- ⁷⁸ 详细分析见Marek Thee, 前引书; 以及Bernd W. Kubbig, “军用-民用副产品: 诺言、前提和问题”, 《发展与和平》, 第7卷, 第3期(1986年), 第199-227页。
- ⁷⁹ Inga Thorsson, 前引书, 第137页。
- ⁸⁰ Robert W. DeGrasse, 《军事扩张, 经济衰退》, (纽约, M.E. Sharpe, 1983年), 第30-33页; 和Bernd W. Kubbig, 前引书, 第212-214页。

- ⁸¹ 详细分析见 Ashton B. Carter, “通讯技术和弱点”, 载于《管理核行动》Ashton B. Carter、John D. Steinbruner 和 Charles A. Zraket 主编, (华盛顿特区, 布鲁金斯研究所, 1987年), 第217—281页。
- ⁸² Bernd W. Kubbig, 前引书, 第209—211页。
- ⁸³ 见 Helena Tuomi 和 Raimo Väyrynen, 《跨国公司、军备与发展》(奥尔德肖特, 古厄, 1982年), 第238—247页。
- ⁸⁴ 见 Akin Fadahunsi, 《发展程序和技术》(乌普萨拉, 斯堪的纳维亚非洲问题研究所, 1986年)。
- ⁸⁵ 联合国出版物, 销售品编号 E.87.IX.8), 第3段。
- ⁸⁶ Steve Chan, “军事开支和经济情况”, 《1986年世界军事开支和军火转让》(华盛顿特区, 美国军备管制和裁军事务署, 1987年), 第29—30页。
- ⁸⁷ 见 Michael Brzoska, “军事开支的报告”, 《和平研究杂志》, 第81卷, 第3期(1981年), 第261—177页; 和 Halcan Wilberg, “衡量军事开支: 目的、方法、来源、合作和冲突”, 同上, 第18卷, 第3期(1983年), 第161—177页。 以及 Gary Goertz 和 Paul F. Diehl, “衡量军事拨款: 不同方法的比较”, 《解决冲突杂志》, 第30卷, 第3期(1986年), 第553—581页。
- ⁸⁸ William J. Dixon 和 Bruce Moon, “军事负担和人类基本需求”, 《解决冲突杂志》, 第30卷, 第4期(1986年), 第660—684页。

- ⁸⁹ 见 Hendrik de Haan, “军事开支与经济增长: 某些理论”, 载于《军事开支的经济学》, Christian Schmidt 主编 (伦敦, 麦克米伦, 1987年, 第87-97页)。
- ⁹⁰ Saadet Deger, 《关于军事开支和资本形成、生产力、经济增长和竞争力的跨部门分析》(1986年4月30日)(A/CONF.130/PC/INF/16), 第5页。
- ⁹¹ Adne Cappelen, Nils Petter Gleditsch 和 Olav Bjerkholt, “经合发组织国家的军事开支和经济增长”, 《和平研究杂志》, 第21卷, 第4期(1984年), 第361-373页。不能将军事开支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积极的历时关系扩大, 以适用于防卫努力同保健和教育方面的政府开支之间的关系。在美国, 1941年至1949年之间, 不存在系统的关系: 见 Bruce M. Russett, “防卫开支与各国福利”, 《美国政治学评论》, 第76卷, 第4期(1982年), 第767-776页。
- ⁹² Nils Petter Gleditsch, 《军事开支和经济结构, 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军事开支和经济结构》(A/CONF/PC/INF/14), 1986年4月29日, 第8页。亦见 Saadet Deger, 前引书, 第5页; 和 Steven Chan, 前引书, 第31页。
- ⁹³ 欲知对有关研究的调查结论的审查, 见 Göran Lindgren, 《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的军备和经济情况》(乌普萨拉, 乌普萨拉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系, 1985年), 第9-18页。
- ⁹⁴ Adne Cappelen, Nils Petter Gleditsch 和 Olav Bjerkholt, 前引书。这似乎可作为非洲情况的范例, 见 B.E. Aigbokhan, “较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成长和军事开支”, 《非洲和平研究所通讯》, 第16号(1987年), 第5-12页。
- ⁹⁵ 《军事开支与经济结构, 特别是中央计划经济的军事开支与经济结构》, 莫斯科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提交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国际会议的论文,

1986年4月24日 (A/CONF. 130/PC/INF/12) , 第4-5页。

- ⁹⁶ Paul M. Johnson 和 Robert A. Wells , “ 1951-1980年苏联军事和民用资源分配 ” , 《 解决冲突杂志 》 , 第30卷, 第2期 (1980年) , 第195-219页。
- ⁹⁷ 见 Augusto Varas , “ 军事开支的经济影响: 军事开支与发展程序 ” , 《 裁军 》 , 第9卷, 第3期 (1986年) , 第85-86页。
- ⁹⁸ 见 A/36/356, 《 关于裁军同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 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 E 82 IX , 第182段。
- ⁹⁹ Saadet Deger 和 Ron Smith , “ 较不发达国家的军事开支和增长 ” , 《 解决冲突杂志 》 , 第27卷, 第2期 (1983年) ; 和 Saadet Deger , 前引书, 第16-18页。
- ¹⁰⁰ 见 Alfred Maizels 和 Machiko K. Nissanke , “ 发展中国家军事开支的决定因素 ” , 《 世界发展 》 , 第14卷, 第9期 (1986年) , 第1125-1140页。
- ¹⁰¹ David Lim , “ 较不发达国家的增长与防卫 ” , 《 经济发展与文化变革 》 第31卷, 第2期 (1983年) , 第377-384页。 亦见 Augusto Varas , 前引书, 1986年, 第87-89页。
- ¹⁰² A/CONF. 130/PC/INF/15 , 第3-4段。
- ¹⁰³ 关于美国分包问题的分析, 见 Jacques S. Gansler , 《 国防工业 》 , (麻省剑桥, 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 1981年) , 第128-161页。
- ¹⁰⁴ 美国最近出于安全理由, 决定阻止藤津有限公司收购费尔柴尔德公司, 就证明了这一点。 见《 新闻周刊 》 , 1987年3月30日, 第50页。
- ¹⁰⁵ 见 Hugh G. Mosley , 《 军备竞赛: 经济和社会后果 》 , (麻省列克星敦, 列克星敦图书公司, 1985年) , 第89-100页; 和 Jacques Aben 和 Nicolas

Daures, “法国国防和就业”, 《国防问题》, 蒙彼利埃大学, 一、Les Cahiers du Séminaire Ch. Gide, 第十五卷(蒙彼利埃, 1982年), 第154-192页。

¹⁰⁶ Rebecca Blank 和 Emma Rothschild, “美国国防支出对就业和产量的影响”, 《国际劳工评论》, 第124卷, 第6期(1986年), 第695页。

¹⁰⁷ 然而, 关于生产力增长的原因及军事开支在其中的作用, 经济学家往往持不同意见; 见 Hugh G. Mosley, 前引书, 第73-75页。

¹⁰⁸ 见 Robert W. DeGrasse, 《军事扩张, 经济衰退》(纽约, M.E. Sharpe, 1983年), 第30-33页。亦见 Nicole Ball, “转变劳动大学: 工业化国家国防工业的转变”, 《国际劳工评论》, 第125卷, 第4期(1986年), 第409-412页。

¹⁰⁹ 见 A/36/597, 《关于裁军同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国际安全的研究》(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 82 IX 1), 第211-215段; 和 Goran Lindgren, 前引书, 第19-23页。

¹¹⁰ 见 Hugh G. Mosley, 前引书, 第100-108页。

¹¹¹ A/37/386, 第60-62段。

¹¹² Anthony J. Dolman, 《资源、政权、世界秩序》(纽约, 珀格蒙出版社, 1981年)。

¹¹³ 见 Harvey Brooks, 前引书, 第182页。

¹¹⁴ 例如见 Raju Thomas, “印度的核方案和空间方案: 防卫还是发展?” 《世界政治》, 第38卷, 第2期(1986年), 第315-342页。

¹¹⁵ 例如见“战略防御计划的成与败”, 《科学美国人》, 1986年11月号, 第54-55页。

- ¹¹⁶ Harvey Starr 等, “国防支出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解决冲突杂志》, 第28卷, 第1期(1984年), 第105—112页。
- ¹¹⁷ 见 William J. Weida 和 Frank L. Gertcher, 《国防的政治经济》, (博尔德, 西景出版社1986年), 第149—153页。
- ¹¹⁸ A/36/597, 第204段。
- ¹¹⁹ 关于某些实验结论, 见 Harvey Starr 等, 前引书; 第116—120页。
- ¹²⁰ Michael Brzoska, “第三世界国家同军事有关的外债”, 《和平研究杂志》, 第20卷, 第3期(1983年), 第271—277页。
- ¹²¹ 见 Rita Williams Tullberg, “不产石油的发展中国家同军事有关的债务”, 载于《和平、防卫和经济分析》, Frank Blackaby 和 Christian Schmid 主编(伦敦, 麦克米伦, 1987年)第302—316页。
- ¹²² Tullberg, 前引书, 1987年。
- ¹²³ 见 Aldo Ferrer, “阿根廷的外债危机”, 《1985年第三世界事务》, (伦敦, 第三世界社会和经济研究基金会, 1985年)。
- ¹²⁴ Robert E. Looney 和 P. C. Frederiksen, “发展中国家的国防支出、政府外债和增长”, 《和平研究杂志》, 第23卷, 第4期(1986年), 第329—337页; 和 Robert E. Looney, “拉丁美洲可能进行军火生产者的财政羁绊”, 《当前和平与暴力研究》, 第10卷, 第4期(1987年), 第159—168页。
- ¹²⁵ 关于比较详细的分析, 见 Dragoslav Avramovich, “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危机造成的不景气”, 《第三世界季刊》, 第8卷, 第3期(1986年), 第953—977页。

- ¹²⁶ Rita McWilliams Tullberg, 《军火转移, 同军事有关的债务和返销贸易》法语经济学家国际会议, 弗里堡大学, 1987年6月1日至3日, 第7-13页。亦见 Stephanie Neuman, “国际阶层和第三世界军事工业”, 《国际组织》第38卷, 第2号(1984年)。
- ¹²⁷ 见A/39/311, 附件。
- ¹²⁸ 见拉加经委会执行秘书处,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危机和发展”, 《拉美经委会评论》, 第26期(1985年), 第26页; 和 Stephany Griffith Jones, “国际债务问题: 展望和解决方法”。《WIDER 工作文件》(赫尔辛基, 1987年), 第17-19页。
- ¹²⁹ Soseph Ramos, “1974-1983年南部锥形地带的稳定和调整政策”, 《拉美经委会评论》, 第25期(1985年), 第104-108页。
- ¹³⁰ Donald Horne, 《公共文化: 工业主义的胜利》(伦敦, 普卢托出版社, 1987年), 第87-91页。
- ¹³¹ R. B. J. Walker, “文化、演说、不安全”, 载于《迈向公正的世界和平》, Saul H. Mendlovitz 和 R. B. S. Walker 主编(伦敦, 巴特沃思, 1987年), 第176-178页。
- ¹³² Robert A. Hinde, “信任、合作、义务与国际关系”, 《当前和平与暴力研究》, 第10卷, 第2-3期(1987年)第83-90页。亦见 Walker, 前引书, 第184-187页。
- ¹³³ Tapio Varis 等在《和平与交流》中探索了群众的作用(圣何塞, 和平大学出版社, 1986年)。
- ¹³⁴ E. Burgov, “军事化的经济负担, 争取安全的方式”。《和平与安全科学研究理事会》, (莫斯科, 诺卡出版社1986年)第65页。

- ¹³⁵ Ingh Thorsson, “争取裁军, 瑞典军用生产改为民用生产的情况”, 第1 A卷: 《背景事实与分析》(斯德哥尔摩, 利珀, 1984年), 第222-223页。 全面分析请见 S. Nadel, "Sotsialno-ekonomiches Kaya apologia gonki vooruzhenya i deistvitelnost" 《Mirovaya ekonomika i mezhdunahodnie otnoshenya》第2号(1987年), 第41-51页。
- ¹³⁶ A/CONF. 130/PC/INF/15, 第8-9页; 和Ingh Thorsson, 前引书, 1984年, 第292-293页。 亦见Seymour Melman, “军事经济改为民用经济的问题”, 《和平建议简讯》第16卷, 第1期(1985年), 第15-18页。
- ¹³⁷ R. Faramazyan, 《裁军与经济》(莫斯科, 进步出版社, 1978年), 第118-121页。
- ¹³⁸ 例如见“经济调整/转变”, 总统经济调整委员会编写的报告(华盛顿特区, 五角大楼, 1985年)。
- ¹³⁹ Seymour Melman, 前引书, 第18-19页; 及A/CONF. 130/PC/INF/15, 第11-13页。
- ¹⁴⁰ Inga Thorsson, 前引书; 和 Nils Petter Gleditsch, Olav Bjerkholt, Adne Cappelen Knut Moum “转变的经济影响: 挪威个案的分析”载于《军事化与军火生产》, Helena Tuomi 和 Raimo Vayrynen (主编)(伦敦, 格鲁姆·海尔姆, 1983年), 第225-258页。 关于西欧转变工作的分析, 见欧洲工会研究所, “裁军和武器工业改为民用生产”, 载于 MacGraham, Richard Jally 和 Chris Smith 主编《裁军和世界发展》(第2版)(Pergamon 出版社, 1986年, 纽约), 第205-224页。
- ¹⁴¹ 见 Klaus Engelhardt, “军事研究和发展的转变: 现实主义还是一厢情愿?”, 《国际劳工评论》, 第124卷, 第2期(1985年), 第181-192页。

- ¹⁴² 见 A/50/553, 《关于安全概念的研究报告》(联合国出版物, 销售品编号: E.86.IX.1), 其中有关于安全的各种观念的讨论。 报告详尽探讨了安全的各层次、方面和学说。
- ¹⁴³ A/37/386, 第(3)段。
- ¹⁴⁴ Hugh G. Mosley, 《军备竞赛: 经济和社会后果》(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1985), 第 35-143 页。
- ¹⁴⁵ Ruth Leger Sivard, 《1987-1988年, 世界军事和社会开支》(World Priorities, Inc. 华盛顿特区 1987年)
- ¹⁴⁶ 引自瑞典代表团的帕尔梅夫人在1988年4月儿童基金会执行局会议上的发言。
- ¹⁴⁷ 实例可见 Robert W. DeGrasse, 《军事扩展, 经济衰弱》(Council on Economic Priorities, 纽约 1983) 军事开支对先进工业社会支柱的机床工业消极影响载于 Athony DiFilippo, 《军事开支和工业衰弱: 美国机床工业研究》(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86)
- ¹⁴⁸ 这一问题的概述见 Lee D. Olvey, James R. Golden 和 Robert C. Kelly, 《国家安全经济学》(Wayne, N. J., Avery Publishing Group, 1984) 第 340-348页。
- ¹⁴⁹ Robert Gilpin, 《战争和国际制度的变化》, (剑桥大学出版社, 剑桥, 1981年)。
- ¹⁵⁰ A/37/386, 第 113-125 页
- ¹⁵¹ 区域安全的问题已在 1982 年的报告第 126-131 段中探讨, 另见《共同安全: 裁军和安全问题独立委员会的报告》(Pan Books 伦敦 1982), 第 129-134 页。
- ¹⁵² “裁军与发展”, 《裁军和发展领域知名人士小组联合宣言》(联合国出版物,

销售品编号 E. 86. IX. 5) 第 28(b)段。

- ¹⁵³ 关于对安全的全面定义的倡议，见 Richard Ullman, “重订安全定义”，《国际安全》第 8 卷第 1 期 (1983)，第 129-153 页。
- ¹⁵⁴ 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编号 E. 87. IX. 8, 第 14 段。
- ¹⁵⁵ 大会第 S-10/2 号决议。
- ¹⁵⁶ 《裁军和发展领域知名人士小组的联合宣言》(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 86. IX. 5), 第 28(e)段。
- ¹⁵⁷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 87. IX. 8, 第 35(c)(九)(e)段。
- ¹⁵⁸ 同上，第 35(c)(九)(a)段。
-